

人生借鉴译丛

Siebziger

名人七十从心所欲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Siebziger

七十从心所欲

俾斯麦从心之年还有什么野心？伏尔泰七十多岁时还有什么新的爱好？什么事情对爱迪生打击最大？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龄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

著名的《时代》周刊《谈天说地》专栏主笔格哈德·普劳泽对这一类问题作了探讨，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

ISBN 7-101-03976-6



9 787101 039764 >

定价：12.00 元

责任编辑：王瑞玲
封面设计：毛 淳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七十从心所欲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蒋 丽 译

孔德明 校

中 华 书 局

**Siebz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70 und 8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k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十从心所欲/(德)普劳泽著;蒋丽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人生借鉴译丛/孔德明,印芝虹主编)

ISBN 7-101-03976-6

I.七… II.①普…②蒋…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820 号

书 名 七十从心所欲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蒋 丽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5³/₄ 字数 66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976-6/I·507

定 价 12.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人生如同故事。

重要的并不在有多长，
而是在有多好。

—— 塞涅卡（古罗马）

目 录

前 言	1
-----------	---

全新的七十岁

——阿登纳	1
-------------	---

七十四岁的求婚者

——歌德	8
------------	---

对老人评头论足

——西塞罗	24
-------------	----

保持一副笑脸

——腓特烈二世	36
---------------	----

长寿的投机商人

——伏尔泰	40
-------------	----

畅销书作者

——俾斯麦	52
-------------	----

我跳得棒极了

——维多利亚女皇 68

与病魔作战

——托马斯·曼 76

我从来都不是公众人物

——卡蒂亚·曼 84

八十四岁还偷情

——阿芒德 88

性爱和红酒

——毕加索 92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102

创新的颓废艺术家

——埃米尔·诺尔德 106

迎接挑战的祖母

——戈尔迪·梅厄 116

被女儿告上法庭

——科西玛·瓦格纳 122

固执的丑小鸭

——安内特·科尔布 131

人为什么要活到七十岁？

——冯塔纳 137

地球的确在转

——伽利略 145

老顽固亏损百万

——爱迪生 151

充满了幸福……

——卓别林 162



康拉德·阿登纳

Konard Adenauer

1876—1967

正是这位古稀老人唤
起了德国人民的政治觉醒。

全新的七十岁

——阿登纳

康拉德·阿登纳：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总理(1949-1963)，基督教

民主联盟创建人和主席 (1946-

1966)。

两千年前，大卫作诗曰(《旧约》第90篇)：“我们的生命持续七十载，如果寿命延长，那将是八十载……”他为何使用七十这个数字？这绝对不是一般的经验常识使他想到七十这个数字的。根据考证，当时人的寿命比现代人要短，特别是妇女的寿命更短。即使在今天，也无人敢断言，人的寿命为七十岁。

大卫之所以想到七十这个数字，是因为这个数字本身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旧约》全书里乃至整个宗教和人类历史上，七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月亮按时间顺序形成四种不同的形状：新月、上弦、满月、下弦，每七天为一个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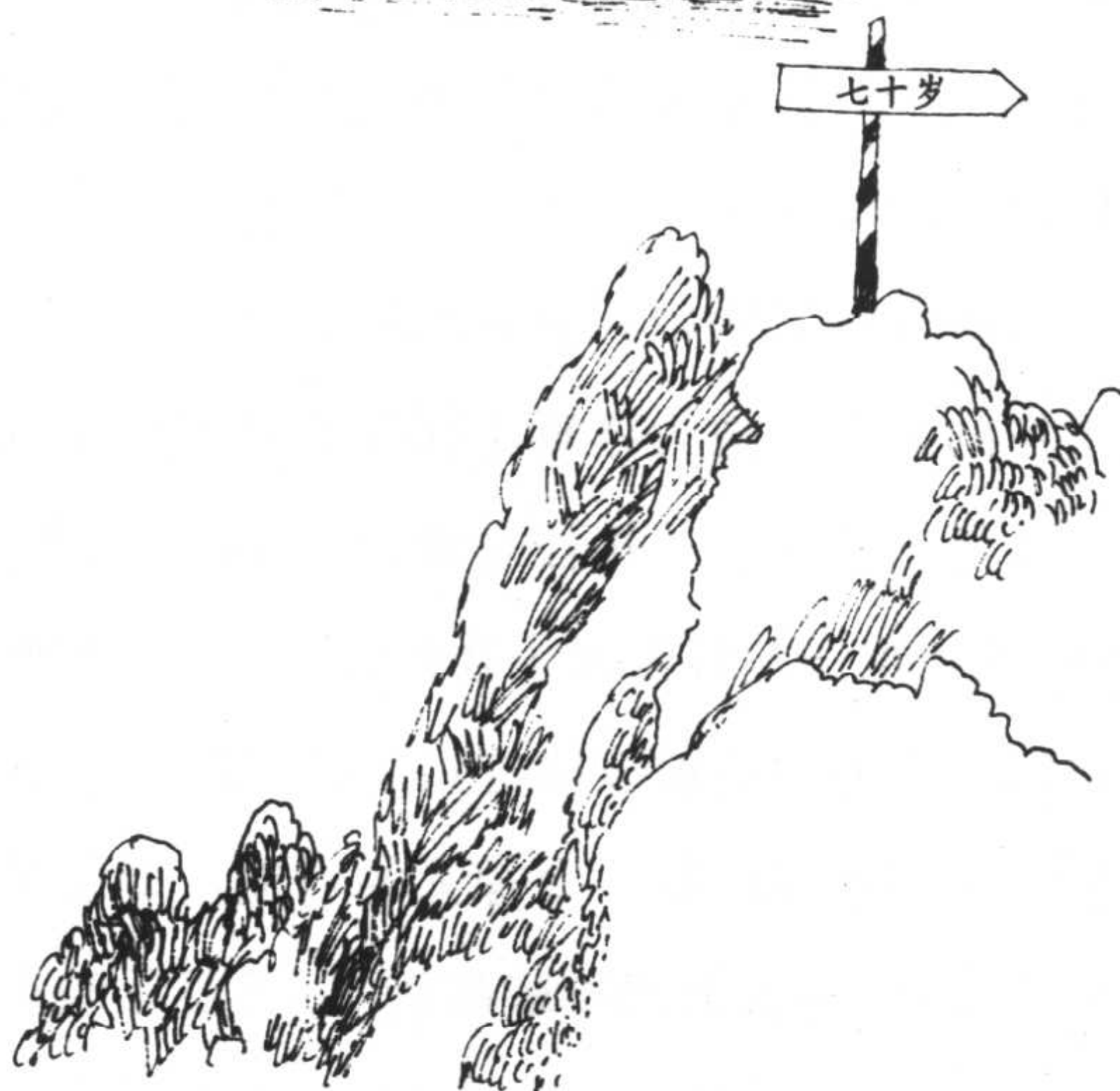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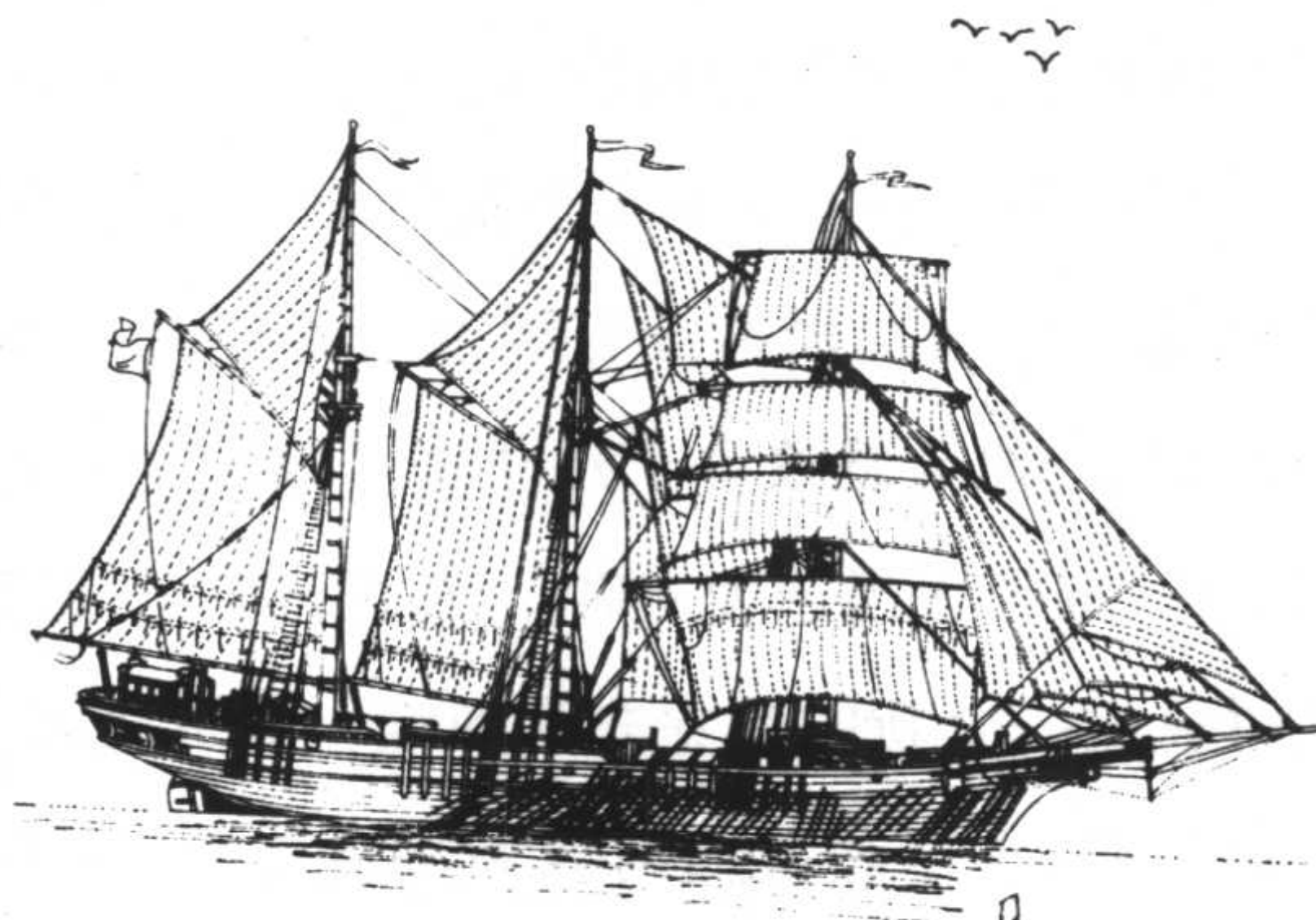
的循环就来源于此。因此,七象征着圆满、丰裕、幸运。雅弗用七只眼睛将世界尽收眼底;上帝七天内完成造物;长达七天的庆典才是最完美的。七十象征整体、全部。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被称之为“*Septuaginta*”,就是“七十”的意思。古老的犹太人认为地球上居住着七十个民族,圣经是为这七十个民族翻译的,也就是为地球上所有的民族翻译的。

谁活了七个十年,即活到了幸运的七十岁,谁就拥有了充实的人生。活到七十岁的人总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历史上许多伟人名人却没有这种好运,把他们的名字加起来多得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的名声很大,我们就误认为他们的寿命也该很长。其实,许多名人并没有能活到七十岁。例如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于1650年左右发明了计算器,但寿命却只有四十岁。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祖父腓特烈一世(红胡子大帝)据说为维护自己在政治方面的统治地位,向教皇的权威进行了挑战。很多人以为他的寿命很长,但他也只不过

七十年代的苏联

活到六十八岁。他号召并率领十字军第三次东征到小亚西亚时，由于心脏病而溺死于萨勒富河。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大人物在从心之年仍然精力充沛地忙于事业。有些人七十岁时才真正开始全新的事业。康拉德·阿登纳就是一例。阿登纳生于科隆，1917年至1933年曾成功地担任过科隆市长的职务。二战结束后，他再次被任命为科隆市长。1945年10月，他因“无能”被英国军管当局撤消了科隆市长的职务。原因是英国军管当局为了解决取暖问题，命令砍伐科隆城内绿地上的灌木和街道上的树木。阿登纳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建议占领区军政府将他们没收的煤炭的一部分发给市民来解决取暖问题。在管理城市方面，阿登纳与英国人之间存在众多分歧，这些最终导致莱茵兰州的最高长官约翰·巴若卡夫将军立即下令解除阿登纳的科隆市长职务，还命令他离开科隆并禁止他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解聘书上写着：“严禁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任何政治或与政治有关的活动。”



七十人回忆录

1946年1月5日是他七十岁的生日,人们以为阿登纳已经到达其政治跑道的终点。英国军管当局的这条禁令不久后被废除了,但是阿登纳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顾及这道不许他参政的禁令,他全然致力于建立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工作,并很快当选为主席。“在德国陷入窘境之时成立一个新的政党非常困难:物资匮乏,政治危机,大多德国人对政治极度失望,表现冷淡……”然而,正是这位古稀老人唤起了德国人民的政治觉醒。

当他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段历史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他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担任总理长达14年之久。此外,他还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而俾斯麦在这个年龄却被迫辞掉首相职务。康拉德·阿登纳一直到老都保持一个惊人的习惯:即便是九十一岁时,他看书都不戴眼镜,每天要看四小时的书。他一辈子都是个工作狂,从来不把今天的事情拖到明天处理,每天完成当天的任务。1963年10月他从总理一职离任后,在生命的

最后四年里一直忙于回忆录的撰写和口述。他写回忆录完全是出于责任感。他自称写回忆录是“烦人的工作”。

康拉德·阿登纳活至九十一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停止思考。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生命将会结束：七十岁那年他被勒令严禁参政，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放弃政治，退休去安度晚年，八十七岁时他还想竞选担任联邦德国总统。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在马林巴德的这三个月，我非常幸福，我不停地被一个又一个的乐趣，一个又一个的诱惑所吸引，就像球一样滚来滚去。”

七十四岁的求婚者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集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列那狐》、《诗与真》、《亲和力》等。

1749年8月28日出生的歌德，年届从心之年也想大胆尝试一下崭新的生活。当他七十岁时，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三年。他给苏彼茨·波塞尔的信里言辞小心而拘谨地写道：“我这个年龄和身体都经不起任何冒险行动了，只要人还活着，就得按照传统习惯去生活。去年，卡尔斯巴德疗养中心再次向我展示其魅力。我考虑再三，决定春天还去那里……”

五十八岁以后的歌德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都去卡尔斯巴德疗养中心或者去其它波西米

亚的温泉疗养中心疗养,如法兰士疗养中心、腾普历兹,后来的马林巴德和埃根。早在三十八九岁时,他就曾两次去卡尔斯巴德进行饮水治疗。他认为饮水疗法十分有效。现在看来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他在饮水治疗期间喝的酒必然比平时要少。歌德说酒的疗效也非常的好。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喝三瓶葡萄酒,他妻子克里斯蒂娜也嗜好喝酒。然而,酒对其子奥古斯特却非常有害,他从小就在父母的熏陶下喜欢喝酒。“酒中富含非常重要的创造性灵感”,老年的歌德对艾克曼说道:“酒的利弊也要看具体情况以及饮酒的时间和数量,酒对一些人有利,对另外一些人就未必有利了。”这里的“另外一些人”也许就指他的儿子。在魏玛公国,他的儿子奥古斯特曾有段时间被公认为酗酒者。在他酗酒特别厉害的时候,歌德为了劝他少喝,自己也控制饮酒。从歌德与埃尔富特的葡萄酒商拉曼的往来信件中,可看出他在酒上花费了大把的钞票。1821年歌德七十二岁,仅这一年他就向拉曼买过900升的葡萄酒。这部分仅仅是德国酒。他还向

其他供应商买酒。这些酒商虽然是在汉堡、不来梅、法兰克福和施魏因富特,但他们主要经营匈牙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酒。

歌德在魏玛的那栋大房子起先是租住的,在他四十岁时,魏玛公爵把这栋房子赠送给了他。这位古稀老人与年介不惑的儿子奥古斯特、儿媳奥蒂莉厄、一岁的孙子瓦尔特一起生活在这里。一年后,第二个孙子沃尔夫冈出生。

“我的后代生活得非常快乐,”歌德在给枢密院舒尔茨的信中写道,“即使他们不相爱,也还是很相配的。而他们的孩子起着神奇的调节作用,他们在魏玛过得十分幸福。”但是,其子奥古斯特的传记作者威廉·博德说,歌德在粉饰太平,他只是按照他的愿望描写家庭关系,他所说的不是真实情况。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根本不是他梦想的那种田园式的生活。奥古斯特与奥蒂莉厄的婚姻毫无幸福可言。奥古斯特向歌德承认:“如果我不经常去酒馆中小坐一会儿,我就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可他却没有说他去酒馆的频率有多高,也没说他泡在酒馆里的时间有多

七十八岁的心愿

长。奥蒂莉厄爱他的父亲胜过于爱他。她理想中的丈夫应该在精神和智力方面优胜于她。而奥古斯特的兴趣却在于好酒好菜。所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妻子那么消瘦,而丈夫却大腹便便。1819年席勒的遗孀告诉她的儿子恩斯特:“枢密顾问身体非常强壮。”次年,他“越来越胖”。第三年,“真太胖了”。后来,“他太胖了,一点都不像他父亲,眼睛越来越小”。最后是,“他越来越像他母亲了”。此处席勒的遗孀暗示歌德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也发胖了。

表面上的不合是显而易见的。奥蒂莉厄的朋友阿黛勒·绍彭豪尔当时经常出入歌德家。据她说,奥古斯特与奥蒂莉厄时常吵架。奥蒂莉厄爱幻想,她多次与别的男人坠入爱河。但这都是些小插曲,因为她的情人大都是旅行的过路客。

从心之年的歌德对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他最终意识到,奥古斯特除了帮自己与出版商签订合同或代表自己参加公共活动、处理日常信件外,其它一无所成;不能再让他在自己的影子下生活。歌德劝说他去意大

利旅行。但是,这样的自由对于儿子来说已经太迟了。在这次旅行中,奥古斯特不幸去世了,年仅四十岁。他可能死于传染性天花,也可能是死于脑溢血,也可能像解剖结果显示的,肝肿涨到原来的六倍。是年歌德八十一岁。

在此前,歌德曾试图抛弃家庭的烦琐事务,彻底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方面。1821年夏,他在马林巴德结识了房东十七岁的孙女乌尔里克·冯·莱维佐夫。两年后,已七十四岁的老人曾经慎重考虑,准备要与十九岁的姑娘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绯闻传进魏玛的“年轻人”的耳朵里时,奥蒂莉厄与奥古斯特都震惊了。他们认为,父亲的再婚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父亲在信中暗示过他正在恋爱,不过非常隐晦。比如,他在过完七十四岁生日后的两天写信打听远在魏玛的儿子是否收到十四天之前邮寄的奶酪,味道如何,并且建议:“也给好友克内贝尔一块或者一大块。”他回家后说,他的这个生日是“跳舞”跳过来的。在这封信中他还补充道:

“现在我们相距甚远，关于我的饮食情况，在狭小但整洁的石头院落里，那边是地窖门和厨房门，可就是在那里，世上最美丽的厨娘在做饭，瞧，她正准备着午餐。味道鲜美吗？由你们来品尝吧！佳人祈祷上帝保佑我们。歌德。1823年8月30日。”

“世上最美丽的厨娘”即指乌尔里克。“佳人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佳人也是乌尔里克。七十四岁的歌德没有据实以告，他想方设法把向乌尔里克的母亲提亲这一段忽略过去。他甚至要求同在马林巴德进行饮水治疗的好朋友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作他的伴郎。迎娶这个十九岁的姑娘已经不只是一个想法了，歌德已更多地落实于行动。魏玛的人们也开始纷纷议论此事。

歌德9月中旬回魏玛之前路过耶拿的克内贝尔家，恰巧儿子奥古斯特也到此做客。奥古斯特立即传信给魏玛的奥蒂莉厄，主题自然就是这件事。“至今还无具体消息透露”，他告知妻子，“但他流露出的尴尬是无法掩饰的……”还说，一旦有“特殊情况”，就会立即寄特快信给

她。

次日早晨，奥古斯特写信给奥蒂莉厄：“昨晚我与父亲谈到将近九点钟。我们一起喝酒，我们团聚的气氛没有受到什么破坏。那个人的名字以及‘家庭’一词均未提及。我开始希望，一切步入正常，这件事情就像一场梦一样消失。”

虽然歌德没有提到她，回到魏玛后也没有立即提及，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地就结束。值得关注的是，古稀老人在家不再感觉那么舒适，甚至觉得无聊。当总理冯·米勒建议他每天出去兜兜风时，他沮丧地回答说：“跟谁出去兜风才会不无聊呢？每天从早到晚见到的人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比较在魏玛和在马林巴德的日子，他接着说道：“在马林巴德的这三个月，我非常幸福，我不停地被一个又一个的乐趣，一个又一个的诱惑所吸引，就像球一样滚来滚去。可是现在这球滚到了角落里，整个冬天我得把自己关在家里。我高高兴兴地从那里回来，而这里却是如此无聊。”

冬天来临时日还早，整个魏玛都在议论他

的结婚计划。奥古斯特和奥蒂莉厄最终决定要知晓真相。一天,父子俩就这个双方都头疼的话题进行了一番谈话,无人得知谈话的内容。但是席勒的遗孀说:“儿子态度非常强硬,奥蒂莉厄气得抽搐。”总理冯·米勒在一封信中写道:“儿子语言刻薄,这个疯家伙摆出一副生气的面孔,还威胁说要带奥蒂莉厄搬去柏林住,这样一切才结束。”

看来,奥古斯特曾威胁要离开魏玛,也就是说离开父亲。歌德一生中在不顺的时候总会生病,这次也不例外。激动和愤怒使他一下子病倒,看上去无甚大碍的感冒却一直纠缠着他。当他总算好转时,医生预言这位古稀老人会因为肾衰竭和并发症水肿活不过来年。

这场大病后,歌德只字未提结婚计划。他的黄昏恋只有《马林巴德哀歌》和乌尔里克·冯·莱维佐夫少得可怜的歌德回忆录为证。乌尔里克在错过了答应嫁给七十四岁的歌德后,在她漫长的九十五年的人生中一直未嫁,始终钟情于这位作家。

在马林巴德梦想结婚的那个夏天，歌德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虽然时间拖得长了些，但其结果却好得多。在歌德众多的传记中，几乎没有一本提到过此事，大概是因为传记作者觉得这个比较俗气，不值一提。事情是有关歌德著作的版权问题，明确地说，就是钱的问题。歌德在卡尔斯巴德发现一家名为“铁十字勋章”书店，亲眼看见他的作品如何被出售给“更多的朋友和陌生人”，而在此之前他对这个版本一无所知。他授权的仅仅是科塔出版的第二版全集（1815年至1819年），共20卷。而卡尔斯巴德这家书店销售的是26卷本的全集，内容远远超过科塔出版社的全集。

“正版的全集只有20卷，为何这加印的版本会出现26卷？”这样“购买前者的主人不就吃亏了嘛”。面对这个问题歌德却无法回答，而且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自己的事情上无所谓，马马虎虎，漫不经心”。一回到魏玛，歌德就写信给他的出版商科塔表示他的愤怒，并要求澄清有关维也纳印制的26卷全集的具体情况。

歌德与席勒

歌德对出版商一直都持怀疑态度，对席勒介绍给他的这位科塔出版商也是如此。自 1808 年以来，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由科塔出版的，此前他经常更换出版商。科塔是位精明能干、无可指摘的出版商。在出版歌德的作品时，他每时每刻都要有亏损的思想准备。当时出版业的风险特别大，因为没有法律来保护出版商和作者的利益，外国的非法翻印就有机可乘。特别是畅销书常被非法翻印。歌德的许多作品根本不好卖，对出版商科塔来说也谈不上赚钱，但他仍然出版歌德的作品。另外，科塔出版歌德主办的杂志纯粹就是蚀本生意。

当歌德向科塔说起那 26 卷书的时候，科塔建议道：“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即出版一套内容更加广泛的新版本。”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出版一套比现行的这套流行版本更好、更详细、更精致的书，才能阻止奥地利和其它国家地区出版商的非法翻印计划。但是歌德没有立即答应。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同意科塔的建议，是因

为其子奥古斯特。当时，歌德已经将出版事务中的所有技术、经济、商业等方面的处理权交给他了。奥古斯特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即作为最著名的德国作家和诗人向法兰克福的德国联邦大会申请一个全德国都有效的作品保护权。歌德按此意写信给故交梅特尼西公爵。此外，他还给联邦议院的很多公使写信请求批准。1825年1月他终于向联邦大会递交了书面申请。

一开始他的申请在法兰克福遭到许多人反对。很多公使指责这位大作家过于看重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是普鲁士和萨克森的代表非常支持歌德。结果，联邦大会宣称他们没有权利按歌德的想法插手修改各州的法律，但是所有的州政府都无限期向歌德提供了他所申请的特权。这是年届七十五岁的歌德为自己赢得的一大胜利，其结果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歌德作品的经济价值陡增好几倍。出版商再也不敢冒风险翻印出版歌德的作品了，因为他的作品受到法律的保护，盗版是违法的。此前，歌德的生活并不富足，虽然他俸禄很高，写作收入也丰厚，但有时

七十从心所欲

他还是不能立即结清一些葡萄酒帐单。他慷慨大方,但收入仅够支出而已。现在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他家的富裕状态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了。

1825 年莱比锡的奥斯特博览会上,歌德的特权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更多的出版商向歌德父子申请出版权。当科塔听说奥古斯特开始和其他出版商谈判时,他非常伤心。他本以为,基于他们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且他一直在冒风险出版歌德的书,他应该是最有资格获得歌德著作出版权的人选。以前一直对出版事务非常头疼的歌德这次却另有所想。但他写信给科塔和他们共同的朋友波塞尔时,却将所有的事情推到儿子的身上。

其实,这位古稀老人一直全力支持儿子的谈判策略,有些甚至就是他自己的主张。因此,毫无疑问,他支持儿子的做法,现在他看重的就是钱。第二版 20 卷的歌德全集(1815—1819 年)的版权于 1823 年转让给科塔。出版商当时付给作家 1.6 万塔勒。这笔款项是歌德全年俸禄

的四至五倍。现在他和儿子又想,如果把全集扩充到 40 卷的话,版权时间为 12 年,那么他们就能得到至少 10 万塔勒。这大约是他作为枢密大臣每年所得俸禄的 30 倍,而且 12 年后全集的版权还是完璧归赵。

如此高的稿酬,当时的人们根本不敢想象。而歌德父子却声称,已有人出价 8 万塔勒购买版权。科塔觉得处境为难。因为有一次他曾提出,他出的价将是在别人的价格基础上再加 1 万塔勒,他说这话还是在 8 万塔勒这个天价无法想象的年代。此时科塔也不相信会有人出这么高的价。虽然 1826 年年初有 20 个出版商在纷争歌德作品的版权,但波塞尔认为实际价格要低得多,至少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迹象表明歌德父子得到了如此高的报价。还有谣言说,奥古斯特不愿坐观其势,他想自己做父亲的出版商。

波塞尔不愿意看到歌德和科塔的关系破裂,他写信提醒他的老朋友歌德重新考虑一下科塔最后一次出的价。这是波塞尔经过仔细考察后认为可行的最高价格:出版 2 万册支付 6

七十八岁所望

万塔勒的报酬；如果定购数量多，出版量大，报酬经相应提高到8万、10万甚至12万塔勒。

歌德父子还在犹豫不决，一直到波塞尔写信再追问了一次：“我坦白地说吧，像这样的计算、考察对我绝非易事，但为了维系你们的友谊，我排除万难。我可以保证，我绝对同意科塔的意见。”收到这封信后，歌德在1826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苏彼茨·波塞尔的催促信已收到。慎重考虑了此事。晚上通知了儿子。”次日，他给波塞尔回信：“您的话有道理！对的！千真万确！阿门！最后的价格。”

此时的歌德还有五年的寿命。他勤于写作，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意大利之行》、《第二次在罗马》以及《诗与真》的最后部分、《浮士德》的第二部分。1830年他的“最后审定的全集版本”，共40卷出版。（歌德逝世后，1832年至1942年还出版了20卷的《遗漏作品集》。）总之，他的晚年过得相当舒适富裕。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还是相当孤寂。1827年夏洛特·冯·施泰因去世，一年后大公爵

逝世，接着公爵夫人与歌德的儿子相继与世长辞。但他还是有许多朋友、同事、笔友。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八十二岁生日，是在伊尔默瑙度过的。年轻时他经常去那里，并曾经意气风发地努力要把废弃的银矿山再度运作起来。某一天他还写信给乌尔里克·冯·莱维佐夫的母亲，回忆1823年那个愉快的夏日，那时他与乌尔里克陷入爱河并准备结婚。时间又回到了8年前。

“今天，我尊敬的朋友，在这庆祝会上，让我举起这杯代表过去几年的酒，这杯让我想起最幸福时光的酒。我经过这么多的出乎意料的不幸之后，虽然您已经安慰过我，我还是请求您帮忙，请求您透露一些消息给我，我保证：我的爱永远不变。——伊尔默瑙 1831年8月28日，忠诚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

“夏日的凉爽，冬日的
暖阳和壁炉里熊熊燃烧的
火焰都足以让我为之一乐。”

对老人评头论足

——西塞罗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
任执政官时挫败喀提林阴谋，力图
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安东尼演
说，被杀，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
《论法律》、《论国家》等。

CICERO

歌德是极不情愿听到类似疾病、衰老以及死亡之类的字眼的，他也不想知道。七十八岁的时候他还表明自己非常崇拜年轻人：“是的，我的先生，一个人做大事非得年轻才行。”这是他在和艾克曼谈论拿破仑时说的话。老年歌德对拿破仑的崇敬之情达到狂热化。如果歌德是个有统治权的公爵，他决不会任命那些满足于现状、贪念安逸生活的人担任高官，这些人做不出什么大事。“我要启用年轻人！……这样统治才有乐趣，才能带领民族前进！”

七十五岁的日耳曼学家和童话收集者雅各布·格林

即便已是高龄,他还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他将自己归于那类“有创造性天赋、同时又有自己特点的人”,“一般的人只能拥有一次青春,而这类人却可以享有两次青春”。我们已经看到,歌德也尝到了年纪大的许多好处。像他那样生活,又能像他那样高寿,正是许多人梦寐所求的。

“但是,”七十五岁的日耳曼学家和童话收集者雅各布·格林于1860年1月26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发表了著名的《年龄谈》,“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所有人都想长寿,同时又都不想变老”。他认为,人们对老年的看法有失公正:“自古以来,人们就不喜欢衰老,他们憎恶、咒骂和逃避即将到来的老年,总之是怨声一片。或许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像会享受生活的希腊人那般憎恶老年。”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将老年拟人化地比作黑夜之女,“容易变化”;欧彼得斯称之“比上埃特娜山顶都沉重”。

雅各布·格林提出:“高龄老人应该知足感恩,因为他们能有幸迈入人生的晚年,能有机会

平静或惆怅地回顾从前,能在闷热的一天后,坐在门前的长凳上一边呼吸夜晚清新的空气,一边追忆往事。”

然而,雅各布·格林这里所指的高龄,并不包括像他那样七十多岁还在辛劳工作的人。他的高龄定位在从心之年之上:“我们的祖先采用了一种具有一定正确性的先进的年龄计算方法。他们主要利用身边的事物来推算。一截栅栏可以用三年,一只狗可以过上一截栅栏寿命的三倍,马的寿命抵狗寿命的三倍,人能活到马寿命的三倍。” $3 \times 3 \times 3 \times 3$,也就是 81 岁。

在当时,某些老年疾病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治疗或者得到有效的控制。雅各布·格林举例指出,严重听力障碍往往最终导致耳聋,严重视力障碍结果同样也是恶化。他当然也提到外貌特征方面的麻烦:牙齿掉了不能再补上,不能嚼东西,随之而来还会有一连串的麻烦。据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很早就必须掩面而笑。

有关老年人生活习惯的缺点,雅各布·格林首先就谈到吝啬。他引用西塞罗的《老年卡托谈

高龄老人》。这位伟大的修辞学家和政治家在两千多年前写成这篇文章，并在文中谈到老年人的吝啬。

“关于老年人，”西塞罗文章中的卡托说，“他不懂，那些老年人吝啬的目的何在。旅途越短，准备的口粮越多，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一个知道自己很快要作别人世的人，为何还要非常恐慌地聚敛钱财，而这些财物在他死后却归于幸运的遗产继承人。他们不顾人们的非议，更加坚定这种趋势和欲望。在所有的喜剧中吝啬鬼大多是老年人。那些年轻人挥霍浪费，因为人生还长得很，就等着分割遗产。当老年人的其它热情都逐渐消退，变得迟钝时，贪婪却与日俱增。对那种能不断翻倍甚至几十倍增加的事物非常喜欢。这样就产生了对未来生活虽危险但惬意的安全感。吝啬鬼像一条保护龙躺在他们的金子上，就像北方传说中阿提拉那样，守着尼伯龙根宝藏却活活饿死。人们谈起那些将死的吝啬鬼：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满箱的金银珠宝，僵硬的手指迟迟不愿离开那……”

雅各布·格林列举老年疾病时没有提及脑力衰退,而历史上这种事例比较多。一例是欧根王子,奥地利帝国陆军元帅、政治家,1663年10月18日出生于巴黎,于1736年4月21日在维也纳去世。七十岁时他作为贝尔格莱德之战的功臣被再次任命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总司令。然而欧根根本不知道周围的情况和他该做什么。目击证人说,他常常回想不起自己刚刚发布了什么命令。别人帮他起草命令,他只需要签个字就行;每次战役中他就是坐在帐篷里玩游戏,时不时地还偷笑几声。

普鲁士年轻的腓特烈二世就是目击证人之一。当时,他还只是王子,参加战争时间不长,但在欧根身边,对他的行为非常震惊。在一封信里他写道:“上帝真能侮辱杰出的天才。”后来,他做国王后,欧根王子的悲惨结局还历历在目:“这是对我们虚荣的侮辱!”他在《时代的历史》一书中写道:“一个是法国将军孔代,一个是奥地利元帅欧根,一个是英国将领马尔伯勒,他们的脑力衰退已尽,最伟大的天才沦落成了痴呆。”

但是,腓特烈自己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他虽然早就疾病缠身,也经常抱怨他的身体,但他敏锐的反应力、求知好学的精神和锐利的目光,却一直伴随他到人生的尽头。腓特烈活到了七十四岁。

雅各布·格林在《年龄谈》中得出一条结论:老年人也有许多长处,而且长处多于短处。他眼中不是一幅“疲倦的、虚弱的、艰难的、不幸的老年人生活图画,而是一幅温暖的、舒适的、有勇气、有工作乐趣的画卷”。这位 75 岁的老人还认为:“老年人在体力下降的同时,健康的感觉却日益增加。”因为,在所有将要消亡的事物内都有一股幸运的力量控制着他坚持到最后一刻。

西塞罗早就认识到,老年人相对于其它年龄层次的人有许多特别的长处。西塞罗对“老年人生活不幸的理由,即活力怠尽,身体虚弱,性欲全无,接近死亡”一一进行了反驳。

就第一种理由他提出反对意见:“确实,人们会承认,船在行驶的时候,全体船员在桅杆上爬上爬下,在船上走来走去,或者舀掉甲板上的水的时候,舵手无需做些什么。他仅需手握舵轮

静静地坐在船尾。虽然,他没有像年轻的水手们那样工作,但他所做的,却更加重要和有效。成就大业远非体力、速度和灵敏能完成的,他靠的是聪明才智、个人的威望和说话的分量。这些是老年人独有的,而且会日渐有增。”

他还以自己的经验为例来证明:“你们可能认为我现在无所事事,因为我确实没有再率军作战。过去我作为士兵、上校、副将和最高行政长官曾经参战。但是,现在我给元老院做参谋,建议他们如何作战,提供作战经验。在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前,我不会停止我的工作。”

“你们看,”西塞罗继续说道,“老年人不仅不懒散、不怕工作压力,相反,他的工作更有活力,更行之有效,工作更加热心。虽然他所作所为的方向取决于他以前所从事过的职业。但他还会做更多其它的事:高龄老人甚至从头开始学新知识。古雅典政治家梭伦自诩他晚年每天都要学习。我也是这样的。我这么大年纪还开始学习希腊文学。我做这件事情真是如饥似渴,全身心地投入。”



对第二种看法,即老年人没有力气,身体虚弱,西塞罗反驳道:“有种说法是老年人没有力气。人们也不要求老人有力气,根据法律以及传统,没有力气的人有些事情就可以不做。人们不会强迫我们做力不能及的事,也从不会要求我们做耗费力气的事情。他们会说,大多数高龄老人都非常虚弱,他们既不能胜任任何工作,也不能再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了。这是对老年人的错误认识,错就错在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身体虚弱。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烦恼,为什么偏偏就把身体单薄虚弱当成是老年人的专利?古罗马统帅西庇阿认为,每个人都必然要进入老年,应该细心照顾自己的身体,与衰老抗争到底。人们必须要像对待疾病一样来对待老年时期的一些身体障碍。他们应该把精力用于关爱健康、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要有规律,要能保证体力得到及时的补充。当然,也不仅仅是身体方面,人们还要注重智力和精神方面的训练。因为老年人的智力会衰退,人们的脑子里不添加新知识就好比油灯不再加油,很快就会熄灭。身体因为过度劳

累而疲劳,但是脑筋却是越用越好……”

他以自己为例:“我帮朋友们在法庭上打官司,我经常去元老院,提出一些我思考成熟的问题,这正是我的脑力,而不是我的体力,体现我的价值。”

至于第三点,认为老年人性欲所剩无几,老年人性生活走到尽头,西塞罗提出了反对意见:“多么神奇的老年礼物,你替我消除了年轻时的烦恼!”性欲总是缺少度,饮食也是一样,那些不暴饮暴食的老年人就可以免受醉酒、消化机能障碍和失眠的痛苦。他们绝对有充足的感官享受:“夏日的凉爽,冬日的暖阳和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都足以让我为之一乐。我住在农庄里,每天要请邻居来做客,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到深夜。老年人不再有什么性生活吗?当然有,但他们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放弃那些不再需要的要求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西塞罗撰写这篇有关老年人的文章,文中详细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和田园生活对老年人的好处以及园丁和养蜂人的劳动。之后他开

始反驳最后一条理由：“常使老年人忧郁害怕的是死亡的逼近，死亡离高龄老人不远了。”西塞罗给出这样一个仅从逻辑上看是正确答案：

“在漫长的一生中没有学会尊重死亡的人是多么可悲呀！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我们不怕死亡的降临，要么是在精神生活完全崩溃时，要么就是相信那死亡将通向永生，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情况。至于死后是痛苦还是快乐，我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谁会那么傻，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去计算自己到底能够活多少年？年轻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要高于高龄老人。年轻人发病快而且严重，治疗又很麻烦，因此，这种人很少能长寿。如果不是生这样那样的病，他可以更好更理智地享受生活……”

西塞罗在文章结尾献上对所有朋友和读者的祝福：“等你们到这个岁数，你们就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我所说的一切。”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身体上的种种疾病并不能影响我快乐的心情。当人们在埋藏我时，我要保持一副笑脸。”

保持一副笑脸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第三代国王(1740—1786)。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领导统一德意志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七年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满身的伤痛凯旋而归。有人对他说，这个胜利之日一定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腓特烈大帝却回答说：“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是告别尘世的那一天。”

腓特烈大帝于1712年1月24日出生于柏林，凯旋归来时他正值五十一岁。那时他已经执政并率军作战了23年，此后他又执政统治了23年。从心之年的他写信给老朋友、被他任命为柏林科学院主席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阿勒姆贝德，信中写道：“人们应该满心欢喜地期待着那个终结我们的愚昧和痛苦的时刻，应该为死亡

二十岁时的歌

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高兴。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我决定，只要我虚弱多病的身体还在运转，我就要保持好的心情。我绝不是抱怨生命快要结束，我是请求公众原谅，我苟活了这么多年，无聊疲惫、了无生趣地度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

腓特烈大帝五十多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他早就自称是高龄老人，而且还一直抱怨他的一身疾病。最主要的是痛风一直在折磨他，而且他还不愿意接受医生建议的食谱。他饱受疼痛和脓肿的煎熬，低烧几乎持续不断。他在书信里描述他“衰老的躯壳”、“快散架的肢体”、“灰白色的头发”、“僵滞的血液”。他抱怨视力几乎丧失，记忆力逐渐衰退，几乎不能工作，他有了和“常人”一样的烦恼。“但是”，他补充说，“身体上的种种疾病并不能影响我快乐的心情。当人们在埋葬我时，我要保持一副笑脸”。

几年前，他曾发表过对年龄的看法。他认为，人在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偏好：年轻人崇尚爱情，成熟男人满怀抱负，老年人爱玩弄政治。

他也戏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老年时期的玩具”。

“如果有人已经经历过世间的一切,他就可以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他实际上只是失去了很少的一部分。年轻人紧紧抓住生命,因为一切都在向他们微笑,他们希望能够自由翱翔,实现所有的愿望”。而事实表明,“人类所有的虚荣都是虚幻的、不复存在的”。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暴露出他无尽的疲惫,他的听天由命,甚至是他对死亡的向往。但是腓特烈大帝总是以责任感来反驳这一点,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停止日常的政治活动,他操心所有重要的事情。七十多岁的他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根本就不上床睡觉,因为他几乎无法安睡——然后就口述一封封信。他在兴趣爱好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他谱曲,修改从前写的诗,并阅读大量书籍。七十岁时,这位普鲁士的国王突然以德语语言批评家的身份自居,重新运用他已然生疏的文笔撰写《德语文学之谈》。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我非常崇拜您，我真诚地希望能看到您穿上我的丝绸缝制的衣裳……”

长寿的投机商人

——伏尔泰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玛丽·

阿鲁埃，法国启蒙运动的导师和精

神领袖。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又

是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著有《查

第格》、《老实人》、《哲学书简》等。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伏尔泰——原名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11月21日出
生于巴黎，自1758年开始定居于瑞士边境的村
庄费尔奈，他在那儿购买了许多土地，七十五六
岁时他在那里建起第一栋房子，建立了一个王
国雏形的庄园，一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共和
国。他们都为他服务，只是他没有把他们当作农
奴看待。工人制作手表，农民养蚕抽丝、生产丝
绸。伏尔泰的创作也从未间断过，他拿起笔来反
对教会，反对不公正的法庭，反对农奴制度。伏
尔泰年岁越大，他的创作就越多，因为他所需的

睡眠时间越来越短。

几乎无法想象，这位因为满身疾病而自称是“费尔奈病夫”的作家在那些年里写了多少东西，仅是他的书信就都已成册。直到最后，他依然与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保持着书信联系。腓特烈大帝给七十一岁的伏尔泰的信中写道：

“我没有魔力使您年轻，但我祝您长寿，祝您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光彩人物和伟大导师。如果文学失去您，那么它的出路何在？没人能代替您。祝愿您尽可能地长寿安康！”

1772年七十七岁的伏尔泰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写到：“天哪，早在30多年之前我就预言过，您肯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然而我的预言并没有能够企及您在整个世界远播的声名；让世界震惊已经成为您不间断的使命；我不知道，您何时会停歇；但我知道，普鲁士的雄鹰会大鹏展翅，越飞越远。我只恳请这只雄鹰，在天空翱翔时向我这个可怜的身影投下一注目光，使我暗淡的心灵恢复生机——您的崇拜者。”

伏尔泰给女皇叶卡捷琳娜的信中谈到的常是一些实际问题。叶卡捷琳娜从 1762 年起成为俄国的女皇，她比伏尔泰小 35 岁。伏尔泰写信给女沙皇说，他想拜访她，去游览她的国家，并看看君士坦丁堡。叶卡捷琳娜二世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在信中请求他原谅她的法文不好：

“我再次握起笔，”她在一封长信后又补充道，“请求您收下这件皮大衣以抵御阿尔卑斯山凛冽的寒风。因为我听说，您最不能忍受寒冷。祝您长寿，我的先生。您到君士坦丁堡来时，我会叫人用西伯利亚最上等的料子为您按希腊风格量身订做一套潇洒的西服。这套衣服比欧洲人所穿的英式西服要舒服漂亮。雕刻家都不愿意雕刻英式西服，因为他担心他雕塑的人物套上英式西服会显得非常可笑。”

君士坦丁堡之约并没有具体计划，只是说说而已。虽然土耳其首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侵略的主要目标，即使她成功地从土耳其人手里夺走黑海附近的辽阔土地，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土耳其人的故事

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土耳其人的。七十六岁的伏尔泰写信给女沙皇的信看来有点讽刺:“我在这荒僻之处听说您今年的远征已经旗开得胜。我请求女皇陛下您告知我,我是否应该在今年或明年就预定好去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车。”

但这位老人并不认为具有讽刺意味,接着伏尔泰又谈起生意来:“我领地的人在辛勤工作,我们能够感受到女皇陛下的善良和友好。我们将在8天内将大约3箱或者4箱钟表寄出,每块表价值8至80路易。这些钟表都是镶嵌了钻石并附有您的肖像——那是一位杰出画家的作品;所有钟表质量都是卓越的,并经过精确校准。因为是为您效劳,工人们都热情高涨。我们的价格比英国钟表低三分之一,但却没有偷工减料。我们的工人们热切祝愿,钟表上的每时每刻都能让您如愿以偿,让穆斯塔法度日如年。但愿北方的女英雄能接受阿尔卑斯山下年老多病的我最崇高的敬意。”

大约七周后,伏尔泰又写了一封长信。这封



信毋庸置疑地表明，先前当作礼物寄出去的钟表，后来成了一笔对他来说有利可图的生意的序幕。他正满腔热情地继续策划：

“尊敬的夫人！……我得知，我领地的工人又寄了一大箱钟表。我狠狠地责骂了这些可怜的工人；他们滥用您的善良，他们做的太过分了。我吩咐他们寄大约 3000 至多 4000 卢布的钟表，可他们寄了价值约 8000 卢布的货物，这很不合适。”

伏尔泰没有要求将所谓的寄错的一箱子钟表发回，而是建议女皇：“尽管土耳其人很喜爱钟表，但我不相信陛下您会给他们那么多。您可以这么做：那批货中有一些带有您的肖像的手表，十分漂亮，价格都不昂贵。您留下价值 3000—4000 卢布的钟表作为礼物，您可以分掉，他们的价格是 15 至 40 或 50 卢布左右。余下的您可以转让给商家出售，这样又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下面他就谈到价钱，方式也极其巧妙：“我再次斗胆恳请您择日汇款 39238 卢布，这是两

次货物的总价格。您有那么多重要事情要忙,我恳请您必须控制您的乐善行施。如果我的工人在一年之内收到一半的付款,我就认为他们够幸运的了。我会提醒他们要有耐心。另外,他们向我保证,而且许多行家也鉴定过,这批钟表价格远远低于日内瓦的价格,比伦敦和巴黎的三分之一还要低。有人甚至说,在彼得堡钟表价格会在原价基础上翻一番;这个,聪明人一试就会知道。”

最后他又谈到未来的交易:“如果女皇陛下您对货物和价格均很满意,我们的工厂将全力以赴生产您预定的钟表。在我的工厂迁到塔干容之前,费尔奈的工厂一直是萨拉托夫地区的分厂。我很想看到,我们的工人能为您的哈吉索菲亚教堂或者阿切兹清真寺定做大钟。虽然您还没有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土耳其人将会非常高兴地从您手中接过带有您的肖像的钟表,每时每刻都尊敬您……”

这时的女皇陛下还没有收到从瑞士寄来的钟表,但她已写信告诉这位精明的哲学家不用

为价格和付款问题操心：“您不要因为多寄的钟表责骂您的工人，这笔额外支出不会让我破产的。如果我此时这么一点钱都拿不出来的话，那真是令人伤心。您不要把我们的财政状况看成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糟糕，您真是错看了我。”

四十二岁的女皇又自豪地补充道：“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作战三年，但我们仍在建设生产，一切都是和平的景象。两年来我们都没有再征收新税。战争经费是固定的，也是经过计划的，它不会妨碍政府其它工作的正常进行。只要我们还有一两杯咖啡喝，战争经费就不会缺少。”

伏尔泰在另一封信里承认，他也向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销售过钟表。在1771年底他向女皇建议或者说是试图劝说她向中国销售他的工厂的产品：“现在也许不是向中国拓展钟表业务的时候，但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总能同时做很多的事情，我称之为真正的伟大、真正的权力。”

这位“阿尔卑斯山下年老多病的人”已经成了一个狡猾的商人。从他的信件中看得出，他懂

得不少广告宣传技巧。在信中他还和女皇商讨丝绸价格，这些当然都是他的费尔奈工厂生产的，那里养蚕抽丝加工丝绸。一次，他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寄了丝绸长袜，并写信道：

“这是我养的蚕宝宝吐出的丝织成的，是我亲自制成的瑞士第一批丝绸长袜。请您赏脸收下！您可以将它们展示给您的爱卿们看。如果他们沒有夸赞我的丝绸华美，没有说它比法国和意大利的丝绸更牢的话，我就放弃我的这个行当。您可以把它送给您的宫女试穿，它一年都穿不坏……”

另外一封信：“我非常崇拜您，我真诚地希望能看到您穿上我的丝绸缝制的衣裳……”

尽管他身上有许多毛病，为此他经常抱怨，可是抱怨之余他好像就不再注意到这问题。伏尔泰在七十多岁、甚至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拥有迷人的魅力，他能写作，能赚钱，他有很强的辩论以及为启蒙运动而战的能力，要他沉默是不可能的事。一次，他向科学院的同事摩西尔·波瓦特医生写信询问：

“我，一个七十七岁的高龄老人，长久以来饱受坏血症煎熬，已经是皮包骨头，牙齿几乎全无，扁桃体经常发炎，还患有肠胃气胀症状、失眠以及其它一些讨厌的毛病。我真诚地向您请教，山羊奶是否能减轻我的这些症状。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指望能够治愈这些毛病看起来是有些可笑，但是我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去做，完成这些事情至少还需要六个月，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山羊奶能否把我的生命维持到那个时候。山羊奶和其它一些必需的泻药混合使用是否会有较好的疗效，在这方面人们是否有一些经验。”

摩西尔·波瓦特医生如何回答的，我们尚不知道。但不管有没有喝山羊奶，伏尔泰又活了八年。他所说的要六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是九卷本的《百科全书问答》，这套书两年后全部出版。除此之外，伏尔泰还在不断扩大他的钟表业，他甚至再次建议叶卡捷琳娜二世帮他把钟表销往中国。他的钟表工厂最终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获得巨大的赢利，原因不在于他，也不在于钟表，而是起初应允他的减税后来又提高了。

老年的伏尔泰除了管理庄园工厂以外,还勤于笔耕,写了大量信件,这真是一个奇迹。八十多岁时他还每天工作——据他的两个秘书报道说——18 至 20 个小时。

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在不久以后终于实现了回到巴黎夙愿。他离开那里将近 28 年了,他的归来受到巴黎人民和科学院的热烈欢迎以及尊敬,但是皇帝却没有重用他。伏尔泰 1778 年 5 月 30 日在巴黎去世时,报纸上有关他的报道是简之又简,教会也拒绝安葬他。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

“他们只想把俾斯麦的书买回来放在家中,尽管他们不识字,也看不懂!真令人感动!”

畅销书作者

——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宰相，著名的“铁血宰相”。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王国迅速强大，并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最终使德国统一。

奥托·冯·俾斯麦曾担任德意志帝国的宰相长达 14 年，为普鲁士王国效力近半个世纪。在他七十岁生日之际，1885 年 4 月 1 日，他收到八十八岁的皇帝的一封信，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公爵！当德意志国家和人民都在欢庆您的七十寿辰时，人们想起了您为祖国所做的一切贡献，为此对您表示万分感激。我也发自肺腑地向您表达我的喜悦，因为整个民族都在举办活动感谢您，向您表达敬意。我很欣慰地看到您获得了最高的认可。我内心非常激动，因为

这种尊敬遍布全国。如今民族昌盛,未来将会更加繁荣。德意志民族展示其真实伟大的一面,伟人受到尊重……”

威廉一世皇帝说的这场全国性的感恩庆典活动形式上不仅仅是感谢信、纪念品、宣传公告、祝福和火炬游行,对于俾斯麦来说最重要的这是一次敛财活动,虽说这时的他钱已经很多。由于有经营头脑,俾斯麦已经成了百万富翁。他经营农产品,主要是出售木材、酿制烧酒、生产纸张。他把橡树卖给铁路局做枕木,向帝国邮局出售纸张。他做这些生意当然是借助了他的首相地位,但他绝对没有腐败贪污。他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还应该归功于国王减免了他的国税。但是教会税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俾斯麦七十岁这年曾威胁文化部部长说他要脱离教会。俾斯麦最不喜欢的就是缴税。1871年皇帝为了感谢他为帝国建立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曾将腓特烈斯鲁地区连同萨克森州的一处森林赠送给了他。这块地的税他只报交了100万马克,而实际的土地税是它的三到四倍。



他想用这次生日收集到的钱财买回申豪森庄园。1815年4月1日他在那里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曾经是那里的年青的庄园主,经营打理过庄园,后来不堪那里烦琐的事物离开了。俾斯麦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223万马克。然而反对派不同意把所有的钱都给俾斯麦,他们决定一半留作公用。俾斯麦非常恼火,因为这样一来,剩下的111.5万马克就不够买回申豪森庄园,还差3.5万马克。他坚决不同意自己支付这笔余额。最后银行家布莱士荣德和门德尔松-巴托尔德为他提供了抵押贷款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位老人不想背负这么沉重的债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他是欧洲最强大的人,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他的地位不再那么牢固了。两年之后“铁血宰相”就不再“铁”了,而是显得很紧张敏感。他甚至对花园里的贝母花王非常敏感,“它虽然有叶子,但是却不结果”。他的妻子在和斯皮岑柏格男爵夫人聊天的时候说(男爵夫人的日记里有记载):“我丈夫老是走来走

去观察贝母花王有没有长出花苞。”她还说,她和她丈夫都看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征兆。男爵夫人觉得十分惊讶,她在日记里提出疑问:“像俾斯麦这样的伟人有这种行为难道不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奇怪或令人惊讶,因为俾斯麦本来就很迷信。但是,如果说他将百合花因施肥不当长势不好来预示前途黑暗,这是没有道理的。花园里贝母花王不开花对七十二岁的俾斯麦来说可能使他联想到自己以后的日子,使他感到欧洲以及世界的不安定。1873年的《三皇协定》因为奥地利和俄国的对立已经失效,所以俾斯麦于1887年6月和俄国又签订《再保险条约》。俾斯麦肯定是想到,威廉一世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了,五十五岁的皇储腓特烈三世(1831—1888)又身患重病,其子威廉二世(1859—1941)还涉世未深、缺乏经验。

俾斯麦的健康状况在七十岁刚出头的那几年比六十多岁的时候要好。他拔掉了好几颗牙齿,使困扰他多年的面部神经痛不再犯了。快七十岁的时候,他在慕尼黑的医生施韦尼格的治

疗和指导下,严格控制饮食,成功地减掉了近五十磅的体重。一般来说,俾斯麦不愿意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他对施韦尼格却十分信任,因为他曾经成功地治愈了俾斯麦的儿子威廉。

当老人返回柏林时,他良好的身体状况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俾斯麦外交部的同僚荷尔斯泰因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工作效率高,同时还是那么好斗。”1885年夏又写道:“他总是比别人强很多,尽管他头非常小,却显得非常健康。后来的不幸并不是由于他多变或者健忘而造成的,而是由于没人敢于指出他的错误。”一年之后,荷尔斯泰因发现他七十一岁的上司“整个人都萎缩了:孤独,神经质,多疑,再无从前的风光”。

因为俾斯麦还是吃得太多,施韦尼格的食谱治疗的成果没有能够维持多久。早餐桌上向来都有许多冷餐肉、肉糜酱、鸡蛋、鱼子酱和熏鱼。照常理,施韦尼格不会让公爵太饥饿,但早餐只允许他吃一块牛排,而不是两三块。这对俾斯麦来说可是一种长期的煎熬。由于俾斯麦夫

人原本就不太同意施韦尼格的治疗方法，俾斯麦又开始大吃大喝了。她很高兴，“爸爸”（家庭称呼）又能开怀大吃，只有这样，他的脾气才会好。他把矿泉水和白兰地或波尔多葡萄酒兑在一起喝。还要补充的一点是，俾斯麦总是接近中午才吃早饭，因为一般他总是一直工作到三更半夜，早上起得很晚。

俾斯麦七十三岁那年，老皇帝威廉一世辞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的儿子腓特烈三世早已病入膏肓，继位三个月后便死于喉癌。腓特烈三世的儿子，二十七岁的威廉二世继承皇位。起初，俾斯麦以为他的首相地位应该是很稳固的。他曾担心和腓特烈三世相处有问题，他不太喜欢腓特烈，而腓特烈三世也不太信任他。主要的原因还是俾斯麦的保守政策与腓特烈的自由政策相左。但腓特烈的儿子威廉二世在继承皇位之前非常崇拜俾斯麦。俾斯麦以为，他和这位小皇帝的相处会很融洽。他一向不住在首都，而是住在乡下的庄园处理公务。柏林的非正式的公务他让他的爱子赫伯特·俾斯麦（1849—1904）全

七十年來中國

权代理。他这样远离柏林,减轻了他和年轻的皇帝之间的冲突。因为威廉二世追求名位和权势,狂妄地想插手一切事物,不是观望,而是要亲历其中,要掌握大权进行改革。俾斯麦总不在柏林,就一直在阻碍其工作的开展。误解就这样产生了,不久皇帝和首相之间的冲突就公开爆发了。

这本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令人惊讶的是,老首相自始至终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当然也就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他对这个急于掌权的皇帝的谦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明智的。事情的起因是皇帝要一个部长向他汇报某个事情。但部长却告知他,没有首相的同意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包括皇帝。皇帝觉得很没有面子,就把俾斯麦叫来问话:“我从来没有从我的部长那儿收到任何一份报告;我听说,没有您的同意或您不在场的时候,他们不能把报告交给我。我还听说,在一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旧得发黄的法律文件里有这方面的详细规定。”

事实上,俾斯麦引用的是 1852 年颁布的一

项内阁指令。在他去世整整 20 年、皇帝退位、君主制终结后,他的《回忆录》才得以出版,其中第三册中俾斯麦是这样回答皇帝的责问的:

“我解释说,事情本不是如此。1852 年 9 月 8 日的那条指令,自从宪法生效后每一个首相都不能违反;指令要求在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必须由首相作出决定,否则首相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只要有首相,人们就要执行内阁指令。皇帝认为,指令限制了他的皇权,他要掌权。我提醒他,皇帝的三位前辈都是谨遵指令,自从 1862 年以来还从没有过这方面的争议,内阁指令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我现在再次提起它,是为了在部长们面前捍卫我已被蔑视的权威……”

这次谈话又产生了争论点和不同的意见。俾斯麦在谈话结束时问皇帝,是否坚持收回 1852 年的内阁指令。回答就是一个“是”字。俾斯麦起初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那么快就被迫辞职。他在回忆录里记载说,他打算把这件事放一放,看皇帝是不是真的要执行他的命令。但皇

七十八年所记

帝次日上午就打听这件事。他通过军事内阁首领汉克将军通知首相，他坚持要废除这条内阁指令。俾斯麦写道：“根据我前面讲到的实际理由，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一个首相如果不赋予他一定的特权，那他又如何工作；如果皇帝执意要废除指令，那帝国首相的称号也应该与它有同样的命运，那样我就毫无异议了……”

俾斯麦的言辞行为有些过激，局势完全可以不发展到这样糟糕的地步。这位年轻的皇帝早就听人说，他的先祖腓特烈二世如果年轻时身边有一位像俾斯麦这样的大臣，他就不会成为腓特烈大帝。皇帝觉得俾斯麦对他不惟命是从，想把他永远革职，然而他还是没有这个胆量，他要俾斯麦自己申请辞职。次日，他又打发汉克将军去首相那里，俾斯麦回忆说——“非常遗憾地告知我，陛下坚持收回指令，期待汉克回去报告说我很快就要辞职了，并让我下午去一趟皇宫，当面辞职。”

俾斯麦断然拒绝了去皇宫、然后被解职的这个要求，他推说身体不太舒服，他会以书面方

式提出辞职。次日,俾斯麦写好辞呈:“请求皇帝恩准我辞去帝国首相、总理以及普鲁士外交部长诸职务,并按照法律规定给我发放俸禄。”威廉二世迫不及待地接下这份盼望已久的辞呈。

辞职之前俾斯麦经常说,他宁愿生活在庄园里,他抱怨公务繁忙。然而当辞去公职没有公务时,他倍感无聊。虽然他写回忆录,给报纸写文章,指点《汉堡新闻》的编辑们按他的意思发消息,但他还是觉得不充实,无所事事。

辞职后的头几个月老人因为无事可做,感到特别难受。他从乡下庄园搬到瓦尔奇,又从瓦尔奇搬到申豪森,后来又回到乡下庄园。在哪儿他都感觉不舒服。他的医生施韦尼格预感这样不行,他努力建议病人自己制定一项具体的写作任务,俾斯麦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俾斯麦回忆录的诞生还得感谢这位医生。7月上旬,他就和科塔出版社签订了6册书的合同。每册书的稿酬是10万马克,9月份开始写。俾斯麦从外交部把共事多年的老友诺塔尔·布赫尔叫来帮忙。此人擅长速记,而且有丰富的文档工作经

验。俾斯麦每天讲述两个小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布赫尔必须将俾斯麦的片言只语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回忆录》相当主观地再现了俾斯麦的政治手段和目标。第一次出版的两册书,主要归功于布赫尔的不辞辛劳。俾斯麦自己不久就丧失了兴趣。最先的两册书在1898年俾斯麦去世后的秋天出版,一上市就成了畅销书。那年圣诞节前,男爵夫人斯皮岑柏格在日记里描述道:

“书店老板舍林尔先生向我诉说他的困难:印刷出版的十万册已经脱销,科塔又不能在短期内供货。值得关注的是,不仅仅是文化圈、政治圈的人购买这书,而且还有许多崇拜尊敬俾斯麦的手工业者、面包师、屠夫也要购买这本书,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他们只想把俾斯麦的书买回来放在家中,尽管他们不识字,也看不懂!真令人感动!”——第三册书,其中涉及辞职的事情,直到帝国崩溃后才得以出版。

俾斯麦对《汉堡新闻》比写回忆录感兴趣多了。当他发现人们不再想聘用他回去工作时,他

认为那些虽然没有署名、但由他授意的文章还有一定影响,至少可以报仇泄愤。然而他对手的数量和影响比他估计的大得多。也许他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无论如何,他必须面对辞职后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例如,七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国会民族自由党在汉诺威的一个市民选区举行的选举。他没能以绝对多数的票数战胜他的对手——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卷烟厂的工人。第二次选举时,他虽然也获得了国会议席,但真正要再进入国会时他又退缩了。他的理由之一是:国会大多数人会回避他。他的这种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四年之后,国会的大多数成员由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南德意志民族党组成。他们决定不向帝国的缔造者、昔日的帝国首相的八十岁寿辰致以祝福。柏林市政府的决定也一样。虽然一年之前皇帝才表面上与他和好,但这次却很高调。他去看望八十岁的俾斯麦,并代表全德意志人民祝他生日快乐。

那段时间老俾斯麦非常孤立,身体又不好。几个月之前,他在一封给他的妹妹马尔韦勒的

信里抱怨说,他一直在与精神和身体作战,但却没有战功。他说,他畏惧“身体上的某处疼痛,更畏惧精神上的打击……”

不久之后,他的夫人约翰娜由于长期的疾病不治而终,终年 70 岁。她把她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俾斯麦,她的逝世使俾斯麦心痛之极。这对俾斯麦的身体也是一次打击。约翰娜去世后三个星期他写信给妹妹:“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回顾 48 年来和她在一起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回忆她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她的恩情。如今一切皆成空。感情是不公平的,但我不能控制。我痛斥自己对如此深厚的爱情没有表示过谢意,人民对我的恩情也一样。这四年来我对人民的爱戴和认可感到欣慰,她也很高兴,尽管有时她对我的反对者感到非常愤怒!现在这股火苗在我的心头渐渐熄灭,希望不是永远,如果上帝还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话。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三周,心境只是荒芜,寸草不生,没有一丝欢畅。”

约翰娜的去世带来的这种荒芜的感觉类似于引退时的感受。八十二岁时,人们又听到了他

非常怨恨的声音，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复仇行为。他的老对手卡普里维在那时也被威廉二世逼迫辞职。在《汉堡新闻》的帮助下，他把1887年签订的《德俄再保险条约》公开化。虽然这个条约不再存在，但暗地里还是生效的，这是德国和俄国的秘密联盟。条约规定，如果两国中的任何一家受到攻击，另一国将保持中立。因为他的后继者卡普里维没有续签这个条约，俾斯麦说，这很可能使俄国与法国结盟。

这篇俾斯麦授意甚至口述的文章引起了轰动。他的新老对手一致认为，这位昔日的帝国首相泄露了国家秘密，他应该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国会最终考虑到俾斯麦从前的功绩以及他年纪大了赦免了他。这是1896年秋天。

从那以后，俾斯麦沉默了。他还住在乡下庄园，他的女儿一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898年7月30日他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维多利亚女皇

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

“我们把家具推到一
边，办了一场小舞会。……
我跳得棒极了。”

我跳得棒极了

——维多利亚女皇

维多利亚女皇：英国女王
(1837—1901)及印度女皇(1876—
1901)，即位后英国加紧向外扩张，
建立庞大殖民地，工商业亦迅速发展，
史学家称“维多利亚时代”为英
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大不列颠女皇、威廉二世皇帝的外祖母、维多利亚，生于1819年5月24日。1890年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把家具推到一边，办了一场小舞会。库尔提斯的音乐如此轻柔，大家跳起四对舞，我和艾迪跳。我跳得棒极了。之后还跳了华尔兹和波尔卡舞。”

艾迪是她的孙子，应该说是她的孙子中的一个。维多利亚和丈夫阿尔贝特·萨克森·科堡·哥达一共生了9个孩子。他们的孙辈人数达到39个，光柏林就有8个，即威廉二世和他的7

个兄妹。

七十一岁的女皇和孙子艾迪——皇储的长子愉快地跳舞时，她已经执政了半个多世纪，从那时起她又继续执政了十一年，直到1901年1月22日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十九岁时，她毫无准备地从自己的叔叔威廉四世的手中接过皇位。她和阿尔贝特幸福美满的婚姻持续了21年，四十二岁那年她成了寡妇。她写过一段话：“我幸福的生活从此结束了，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给予我的了。”

她的孝服穿了很多年。从那以后，只要她的身份、时机许可的话，她都穿上孝服，就为了表明“他的愿望、他所有的计划，他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我行动的准则！世间没有力量可以阻止我去做他决定的事、他想实现的事”。

“他”就是她最亲爱的阿尔贝特，她什么都不要，只想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她就当他还活着一样，并如此坚持了几十年。阿尔贝特房间里的东西还是按他生前的样子布置，每晚他的床都准备好，第二天起床穿的衣服放在一旁，洗脸



亲爱的,一切
都是老样子!



盆里放好热水。

维多利亚想通过阻止时间的脚步来度过时日,她必须让自己时间的脚步也停止下来,这样做才显得有意义,否则她就会离她去世的爱人越来越远。因此她决定将自己的东西从这时开始不得有所变动,她的家具,她的收藏,很多的器皿,裙子、外套、貂皮大衣、太阳伞等,凡是属于她的东西,照片、油画、花瓶,就连她儿时的洋娃娃,一件都不许拿走,也不能移动,就连她死后也不许动!她让人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为了保证这些东西永远像她希望的那样摆设,即使在不得不移动的情况下,如更换柜子、窗帘、椅子,都保持原样,她便叫人做了详细记载并对摆设进行拍照。这些记录最后装订成许多本,她经常会翻翻看看。

在她继位五十周年庆典的那天早晨,维多利亚像往常一样来到已经过世二十五年的丈夫的陵墓前和他说话。庆典持续了好几天,第一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道:“这天总算到了!尽管儿孙满堂,他们都在我身边,但我还是感到孤独。”

次日晚上：“我独坐在那里（唉！我亲爱的丈夫不在一旁，要是他在，他一定会很为我自豪），四十九年前我就坐在那里，接受大臣和贵族们的朝拜……”

“黄金周年”十年后她又迎来了“钻石周年”庆典。已经七十八岁的维多利亚在伦敦游城后写道：“我的车沿街走了六英里，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我相信还没有人获得过这么多的尊敬。他们激动得真是无法描述，他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每张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我感到高兴，由衷地感谢他们。”

虽然女皇的身体很硬朗，但卡尔·海因茨·沃克尔撰写最全面的《维多利亚生平传记》里说：“但她在不少方面对周围人来说已经是个负担。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不肯睡午觉，不仅仅是晚上，而且下午也容易打瞌睡。宫女们都养成习惯，她打盹的时候，谈话娱乐都照常进行，这样女皇自己醒来时就不会觉得她是被叫醒的。君主都不喜欢听不中耳的话。她个子非常娇小，出于女性的虚荣心，常穿一种镶花边的高跟靴子，

七十从心所欲

这样看起来高一些……”

其实高跟鞋也没使女皇高多少，维多利亚本来就只有一米五高！她的体形又比较肥胖，当时的时尚是穿多条衬裙，这使得她肥胖的身体更显臃肿。她吃得不多，但很喜欢吃，而且近乎贪婪，她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她喜欢喝啤酒，晚年在下午茶时还喝上几口苏格兰威士忌。最后几年里她才瘦了下来。

她的虚荣心还包括她从不戴眼镜，虽然她早就需要一副眼镜了。七十五岁后在房间里她戴上眼镜看书，但在公开场合绝对不戴。为了不让女皇太在意她的视力衰退，秘书们给她看的文件字是越写越大。直到八十岁时她才承认视力减退这种必然的生理退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她才大方地戴上眼镜看献词和祝寿语。

女皇虽然身体很虚弱，但还一直坚持工作，直到去世时才退位。理查德·瓦格纳在女皇五十九岁时曾受到过一次接见，1877年，女皇第二次接见了她。瓦格纳回去后对妻子科西玛说，这个愚蠢的女人还不退位把皇位让给儿子，真是

不可思议。科西玛的日记里有过这段记载。女皇快八十一岁时还出访爱尔兰，“我真害怕我会不行”。之后，在八十二岁时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地——按官方的说法——“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就是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也不会没有东西可写。”

与病魔作战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二战期间流亡国外。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威尼斯之死》和《魔山》等。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曼曾经写过一段话，说他认为七是旧约中的幸运数字，这对他也有重要意义，因为他这一生一般是七年一个周期。他说十个七年，即七十岁时，他就会死去，他的母亲也是七十岁时去世的。他的妻子卡蒂亚·曼多年之后在《无字的回忆录》里道出了她的猜测，即实际上托马斯并不相信这些。也许托马斯·曼活到七十岁以后就再也不能相信他从前的预言了。尽管死神没有降临，却时刻在提醒他。他患上一种威胁生命的疾病：七十一岁时他被诊断为肺癌。

1875年6月6日出生于吕贝克的托马

七十周年纪念册

斯·曼当时住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1933年他被迫流亡，或者说他出国参加音乐家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后就没有返回德国。那时希特勒已经掌权当政，他们全家移居瑞士，先是苏黎世附近的库斯纳赫，后来移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讲授歌德、瓦格纳、弗洛伊德，1949年他搬到加利福尼亚。

流亡的艰辛无法想象，损失也不计其数——他不得不放弃慕尼黑漂亮的房子、家具和众多的书籍，还有银行里的存款，甚至连1929年他从瑞典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也付之东流。幸运的是，他在美国很快也得到了认可。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3年出版)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心之年的托马斯·曼一共作了55次名为《德国听众》的广播电台演讲。为此有人非常敌视他，并且恶意诽谤他。他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成了他对生活的告白，同时也是对德国“内向流亡”的批评。就在这部小说的创

作过程中,托马斯·曼生病了。

25年后,已经是八十七岁的卡蒂亚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肺癌确诊的那段时间,我处境很困难,孩子们都不在我身边,没有人帮我的忙。我不得不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很多人给我这个或那个建议,请这个或那个医生。”最后她选中一个医生,他告诉她:“病情很严重,是个肿瘤,是癌症。”同时,他还建议卡蒂亚将病情迅速告诉病人。卡蒂亚·曼没有同意这样做,只是告诉她丈夫,医生诊断后发现他的肺上有脓肿,要做手术切除。

在别人的建议下,他们去芝加哥找到当时一流的肺病专家亚当大夫。“我们很快用车把我丈夫带到芝加哥,后来手术的前期准备又花了好长时间。他们制作了一个人工气管,借助它可以找到肿瘤。手术进行得超乎想象地顺利”。

他右边的肺被切除了一大半,还抽掉了一根肋骨。托马斯·曼在手术过程中——卡蒂亚说——“状态惊人地好”。“医院的人说,他们这还是第一次给年龄这么大的病人做这种高难度

托马斯·曼传

的手术”。托马斯·曼曾经以为自己的寿命只有七十岁。经过这次手术之后他说这次生病是“死亡的替身”，他认为要不是他立即又投身到《浮士德博士》的写作中去，也许他不会恢复得那么迅速。卡蒂亚说：“他无论怎样都要把这本书写完。”

托马斯·曼最终还是完成了巨作《浮士德博士》。1947年该书出版，在德国获得巨大反响。同年，托马斯第一次回到战后的欧洲，但他没有去德国。其间他又写了一本书《浮士德博士一书的产生——一部小说的小说》。两年之后，1949年歌德诞辰200周年使托马斯·曼回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七十四岁的他被邀请做一个关于歌德的报告。家乡迎接他的不仅仅是友好和热情。有人指责他不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作报告，还到苏战区的魏玛作报告（尽管是当时的自由民主党领袖，后来的第一任联邦总统奥多尔·豪斯建议他这样做的）；他们严厉谴责他所谓的“共产主义”。七十四岁的老人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占领区，我所访问的是德国。德

国是个整体,不是占领区。”

几年之前,在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新年祝词里,托马斯·曼已经就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人们既然已经赋予我德国人的身份,德国文化的领头羊,那么我就要努力坚持下去。”

托马斯·曼虽然在美国获得了成功,而且荣获了最高的文学奖,但他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难以翻译,属于德语国家的人民”。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终要求“回到德语国家去生活”。年届八旬的老人又回到了欧洲,定居瑞士,先是租房子住,后来在苏黎世湖边的基尔希山买了一栋房子。他还是继续写作,还有许多计划。他夸口说:“就是活到一百二十岁,我也不会没东西可写。”

他完成了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同时他又将多年前开始撰写的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完稿,1954 年出版并同样获得了成功。托马斯·曼的思路一直很清晰,而且还不断有新意。肺部手术后他惟一改变的就是工作

地点和写作时身体的位置。“他还从没有呼吸困难过……”卡蒂亚·曼说，“他不用桌椅，因为那样坐着会令他的背部酸疼。他坐在沙发角上，把手搁在扶手上，纸放在胸前的台子上。后来他一直都是这样写作的。除此之外，他可以站起来做他愿意做的事……”

1955年是席勒去世150周年，托马斯·曼准备在纪念会上的发言稿。卡蒂亚认为他的所有发言都太长，原计划写20页的发言稿，结果他却写了120页。女儿爱丽卡不得不将稿子精简到六分之一。这一年正好也是托马斯·曼八十岁的寿辰。这年1月份他写道：“……今年要忙了。5月份在斯图加特、慕尼黑、魏玛，还有瑞士，都要召开席勒纪念会。接着就是我八十岁的生日了，看得出来，他们都在忙着让我不要变得太老……”

后来，卡蒂亚·曼说：“没人想到托马斯·曼会活到八十岁，也没人想到他直到八十岁生日之前还是个效率非常高的人。他紧张、敏感，容易抑郁；但大多数艺术家都是这样。他的身体状

况也不稳定,总有那么点小毛病;最严重的就是肺癌……”

托马斯·曼在席勒纪念会上的讲话以及他自己八十岁生日庆典都非常成功。他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奖项、勋章,以及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们献给他的祝词。他家乡吕贝克的市民曾经因和《布登勃洛克一家》里的人物对号入座而对托马斯·曼耿耿于怀,但这次他们也非常宽容地赋予了这位故乡的儿子“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切忙碌之后(托马斯曾预料到这些活动会要了他的命),他去诺德威基疗养。在那儿他被检查出血栓后,立即就被飞机送回苏黎世的州立医院。这次医生却无能为力了。

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死于——后来才确诊的——动脉硬化症。其实这跟大脑一点儿也没有关系,血栓只是并发症。



卡蒂亚·曼

Katia Mann

1883—1980

“只要人们想起我，就
一定不会忘记你……”

我从来都不是公众人物

——卡蒂亚·曼

卡蒂亚·曼：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之妻。

卡蒂亚·曼：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之妻。

托马斯·曼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卡蒂亚七十二岁。他们一起生活了将近 52 年，共有六个孩子：爱丽卡、克劳斯、戈洛、莫妮卡、伊丽莎白、米尔克。

卡蒂亚是富有的慕尼黑大学数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的女儿，聪明美丽。和托马斯·曼结婚后，她放弃了数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学业。从他们结合的那天起，她就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和托马斯·曼的相适应。三十二岁时托马斯·曼写过：“我有光华围绕，幸福无与伦比。我结婚了，有一个公主般年轻貌美的妻子，假如你愿意相信的话。她的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她本人则已通过大学升学考试，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托马斯·曼自己在学校的成绩不是

特别好。

后来他满怀感激地写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位聪明、勇敢、温柔的妻子，我这艰辛、动荡和需要耐心的一生会是怎样的。”他向妻子发誓说：“只要人们想起我，就一定会不会忘记你……”

她不仅要带孩子，管理若大的一个家庭，还要——据托马斯·曼说——“负责看我写的书和草稿，参加慈善活动，做一些咨询工作等等”。和托马斯·曼家族的其他人不一样，有一件事她从来不做，就是写作。1974年出版的《无字的回忆录》是她和儿子米尔克、女儿伊丽莎白的一些谈话。九十一岁的老人对这本书的出版这样解释：

“我这漫长的一生都过着很隐蔽的私人生活，我从来都不是公众人物，我觉得那样不合适。总有人要我写出我的回忆录。但我却说：在这个家里总该有一个人不是作家。现在我同意记录这些谈话都是因为我的弱点，我心太软。”

卡蒂亚·曼对儿子戈洛说：“冯塔纳曾经说过：人只要没死，就必须活着，现在我就只好试

试看。”之前,她还说:“我这一辈子从来就不曾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说这话时卡蒂亚·曼还有六年的时间来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去世时九十七岁。



路易·弗朗措斯·阿芒德

Louis Francois Armand

1696—1988

“虽然我八十四岁了，
但我还打算要一个孩子，一
个比你好的继承人。”

八十四岁还偷情

——阿芒德

路易·弗朗措斯·阿芒德；法国

外交官、军官，后来升至将军。

法国黎塞留的公爵路易·弗朗措斯·阿芒德，七十多岁甚至八十多岁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很得意自己使巴黎和凡尔赛上流社会几乎一半的男人都戴上了绿帽子。他与被称为“浪荡公子”的意大利作家卡萨诺瓦是同时代的人，但在晚年他比卡萨诺瓦还要风流。

路易·弗朗措斯·阿芒德公爵决定第三次结婚时，已经快八十四岁了。他这么做，只是想气气他的继承人，即他的儿子。他儿子自己也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事情的起因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开始好像只是消化不良，后来却恶化了。这让他下决心向一个四十三岁的年轻寡妇求婚。公爵自己这样写道：

“我想抽鸦片，但是胃却疼痛万分。我现在

的情况不妙：我只能看、听，却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不幸有时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这次生病促使我决定结婚，我要在我虚弱的身体和我的儿子之间设立一道保护栏。我看到他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自居，他要别人把我的钱都榨干。要不是我的男仆照顾我，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拼命抵抗并且发誓，谁要想来害我，那就得先把他杀死。我的意识逐渐清醒，我一能用语言交流，第一个想法就是给 R 夫人写信向她求婚，而且婚期越早越好。”

他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结婚，是为了能在斋期（复活节前四十天里）就举行婚礼，他设法争取到了大主教的同意，接着他威胁他的儿子：“虽然我八十四岁了，但我还打算要一个孩子，一个比你好的继承人。”

他的这个愿望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的妻子在婚礼后不久就震惊了，那时她已经怀孕，而他竟然背着她出去偷情。他的传记里记载说，为了阻止他再出去偷情，他夫人坚持不肯“让他再像往常一样每天吃饭前喝一小勺壮阳药。这是他

自己根据一个秘方配制的：一种棕色的像蜂蜜一样的液体，闻起来像藏红花的味道”。尽管如此，好长一段时间她还是要费尽心思防止公爵再去偷情。一直以来，偷情对公爵来说都是非常诱人的事情。

这个个子矮小、瘦弱的男人整日被浓重的香水味缠绕。当他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并想巩固他的政治家地位时，他又走上老路：他给国王拉皮条。关于这一点，他在给女友的一封信中很巧妙地解释说：

“我在帮陛下促成他的好事时毫无顾虑，别人可以送给陛下一幅漂亮的好画，一只可爱的花瓶或一个装饰品，我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因为帮陛下成全世界上最好的事——女人而脸红。我们应该为陛下提供一切服务；我们可以像贡献其它礼物一样为他送上美人。”

路易·弗朗措斯·阿芒德，法国将军，一直活到九十二岁。他威胁儿子要再生一个继承人的话最终没能实现：公爵夫人的流产让这个威胁落空了。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1881—1973

“您不结婚是错误的，
这有用。”

性爱和红酒

——毕加索

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刻家，立体主义画派主要代表，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发展作出非凡贡献。代表作有油画《格尔尼卡》、《亚威农的少女》、宣传画《和平鸽》等。

“精神会不会老？”这是五十三岁的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希尔提出的问题。他的一生几乎都用来撰写他的长篇巨作《没有个性的人》，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部作品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他在日记里这样回答道：“肉体在衰老，但是精神和意识依旧。总之，它们衰老的方式不同。我们晚年时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闻到、尝到的和年轻时基本上一样。但是智力也发生变化，但不是变差，而是变好。感官功能下降，但这很容易弥补。总之，大家都明白，老

七十年代的西班牙

年人的身躯里还隐藏着年轻人的精神。是的,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是孩子气。”

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仅仅活到四十五岁,他曾经说:“衰老的悲剧不在于你老了,而在于你还年轻。”画家科林特从来不喜欢出国旅行,但在他六十七岁生日的前四天死于在国外的旅途中。他曾对他的妻子说:“你知道吗,我很能理解为什么老处女总认为自己还是十八岁。人们注意不到自己老了,我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小伙子。”

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0月25日出生于西班牙南部港口马拉加。七十岁时还当自己是个年轻人。1951年10月25日举行了他七十岁生日盛大的庆典。他当时住在瓦洛里,并获得荣誉市民的称号。庆典是件辛苦、烦人的事情,除了朋友、政府要员,还有党派人士——毕加索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都来参加。他以高明的交际手段合理地组织安排了这次庆典。

那时他已经和弗朗西斯·吉洛特一起生活

了五年,并且生了两个孩子,四岁的儿子克洛德和两岁的女儿帕洛玛。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俄国的芭蕾舞演员奥尔迦·柯克洛娃。1918年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保罗。1935年他们分手了。后来他又爱上了玛丽·特蕾瑟,生了一个女儿玛娅。不久他又移情别恋爱上了多拉·玛尔。但他并没抛弃他的妻子和情人们。毕加索从来不抛弃任何属于他的东西,包括人、房子,还有他的画;总之,他周围的一切东西。1943年他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弗朗西斯·吉洛特。她是一个模特,同时也是一个画家。1946年春天起,他们同居了。他经常给她画肖像,最著名的是《女人——花》。她的青春朝气感染了毕加索,一向坚持医嘱的毕加索现在也用“性爱和红酒”来维持他的青春和健康。

毕加索七十岁时,他的好友保罗·艾吕雅在伦敦作报告时说了一句名言:“毕加索,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今天七十岁了。”他还说:“他凭记忆就能画出夜晚,就像画一个苹果一样简单;瓦洛里家中花园的夜晚——一个带斜坡的很普



通的私人花园。房子的一面是一个灯光照耀下的水池、草坪。一开始,我没觉得瓦洛里的夜晚有多妩媚,但是在我身临其境之后,我敢肯定地说我在普罗旺斯这个地方度过的每个夜晚,都不由自主地想到画面中的夜景。毕加索的所有肖像画都很逼真。在画中人物多了一层真实的光彩。随着外貌特征的不断变化,光线角度的不同,他表达出永恒,他将一系列的画都变成为永恒,把他的经历汇聚成一个整体。”

毕加索是个工作狂,虽然他早上起得很迟而且经常是醒来后赖床很久。当他醒来时,他总是很抑郁,认为——如果人们相信弗朗西斯·吉洛特的回忆录里的说法——自己得了重病:“我胃痛,”他抱怨,“我怀疑这是癌症。没有人关心我……所以我才会如此不幸,没人理解我。也是,他们为什么要理解我?大多数人都是愚蠢的。我还可以跟谁讲话?总之,生活是件恐怖的事情。”

他会这样坐在床上嘀咕个把小时,最后他终归要起床。中午的时候他开始工作,一工作就

七十岁时的毕加索

是几个小时,而且注意力非常集中。他总是很好奇自己到底会画出什么,因为开始画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曾经说:“如果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他再去做还有什么意义?因为人一旦知道他将要做的事情,就会失去兴趣。如果这样,他最好是做一件其它的事。”

毕加索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作家保罗·埃洛德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八十岁、甚至是九十岁的毕加索,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毕加索坚持每天工作数个小时;重要的是,他还一直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创建新的风格,使用新的技巧。他绘画、素描、刻铜版画、做雕塑、陶瓷,还参加电影的拍摄工作。这个矮小但结实的男人真是非常健康,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虽然他每天都嘀咕自己得了癌症,肯定马上就会死掉,但却从来没有生病,他总是能集中精力去工作。

八十三岁那年,毕加索几乎一年没有创作。1964年弗朗西斯·吉洛特和美国记者卡尔顿·莱克共同合作,在美国出版了《我与毕加索的生

活》。毕加索对此非常生气,因为书中弗朗西斯暴露了毕加索的许多隐私。她把他描写成一个情绪化、胆小、迷信且极度自私的人。该书完全损坏了毕加索的形象,书里的毕加索非常可笑。他把吉洛特告上法庭,但没有胜诉。他的反击使这本书更加畅销。

这本书产生的源头是 1953 年夏弗朗西斯·吉洛特和毕加索的分手。其实两人的关系早就出现了裂痕。弗朗西斯有一天对七十三岁的毕加索说,她——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可不想让她的余生陪伴一座墓碑。另一种说法是她对毕加索说,她要找一個同龄的人为伴。她把两个孩子都带走了。

毕加索无法理解他们两个人最终会分手,他们的分手不完全是弗朗西斯·吉洛特的错。毕加索总是喜欢漂亮的女人,那时他又结识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杰奎琳·洛克。七年之后,接近八十的他娶了她。但是婚礼非常隐秘,很可能因为他不能忍受记者的追踪。当时杰奎琳才三十五岁。

毕加索的晚年

毕加索在晚年尽管工作量很大，但他总还是留有娱乐的时间，最多的就是观看斗牛。他九十岁寿辰时，法国政府提供给他一项特殊的优待，就是在卢浮宫的画廊里挂出了毕加索的八幅画。他们还从来没有给予任何一位在世的艺术家提供过这样的机会，卢浮宫的画廊里悬挂的都是最著名的画家的最出色的作品。

毕加索八十五岁时不得不做了一次前列腺手术。手术后他恢复得很快，不久之后就又开始工作了。在此期间他的画的价格一路飙升。九十一岁时他也是从中午一直工作到夜里，有时一直忙到凌晨6点钟。1972年或1973年冬天他得了流感，这次他恢复得很慢，而且没有完全恢复。1973年4月7日，他感到呼吸困难，医生诊断出肺炎。此外，他的心脏也出现了问题。次日，一位心脏病专家，同时也是他的朋友来为他做检查。呼吸困难使得这个已经起床刮过脸的病人不得不再躺到床上。他没感到任何疼痛，只是十分虚弱，昏昏欲睡。接近中午的时候，他把手伸向坐在一旁的妻子杰奎琳，对他旁边的单身

汉医生说：“您不结婚是错误的，这有用。”之后，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毕加索说结婚是有用的，到底是想说明什么？大概是说明，这样晚年就不太孤单了。毕加索在七十多岁时就经常感到孤独，特别是和弗朗西斯·吉洛特分手之后。孩子只是刚开始来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许多朋友都在他之前离开了人世：保罗·艾吕雅、亨利·马蒂斯、乔治·布拉克、让·科克托、格特鲁德·施泰因、艾伯托·加柯梅蒂和他最好的朋友亚姆·萨巴泰（他一直和毕加索在一起，帮他解决日常问题）。晚年的毕加索——和毕加索私交颇好的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奥布赖恩这样说——还有“上百个朋友，其中也有一些不谋私利，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好朋友。他生活在孤独之中，生活在被人群包围的孤独之中。”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如果到最后一刻我的
眼睛和耳朵还都好使，我就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瑞士艺术文化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一书是其声誉卓著的主要著作。1867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一书是其专门研究建筑风格的著作。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历史片断》和《世界史观》概述了其历史哲学思想。

1818年5月25日艺术文化史学家布尔克哈特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至今仍然声誉卓著。(1872年柏林大学让他接任莱奥波德·冯·兰克的职位,他没有接受。)从心之年的他在写信时总是心存感激地说他还能看得见,而且读书也没有困难;他希望以后的几年里依然能够如此。还在从事教学的他给老朋友作家保罗·海泽的一封信里写道:“作为一个七

十二岁的病怏怏的老人，我逐渐放弃了一些研究和兴趣爱好；每一次我安排下学期的课时，总是要问自己，那时我的身体还硬朗吗，还吃得消吗。幸运的是至今我的视力还很好……”

三年以后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无需否认，几个星期前我已经辞职，但事出有因。三周以前我左边的坐骨神经疼痛而且还有哮喘，最后竟然还出了疹子。尽管我还能讲话，但是每一个动作（如果不是很缓慢的话）都会让我喘得不行，汗水直淌，这种情况我是无论如何没法工作了。我现在也已经是七十五岁的人了。”

接着他谈到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同时也提到他不能再承担繁重的工作了：“您可能不相信，一个老人放弃所有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多大的勇气。我现在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别人看不上的工作，我不能再做繁琐的事情了！一想到那些我就开始出汗。医生给我的心脏病还有肺上的毛病开了药，我每天还要接受推拿按摩（治疗骨神经痛挺有效），但我身体的各个部件都已经老化了，我的三个兄妹已经死于心脏病……如果

到最后一刻我的眼睛和耳朵还都好使，我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当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完成了一部著作，他在这里又补充道：“谁都不会在我背后议论我‘过度疲劳’，我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总是安排得很巧妙。”

如果完全不工作他也活不下去。不久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哮喘一直困扰着我，心脏病又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病，医术高明的医生也只能是拖延我的生命。我每天出去两次，中午去读书会，晚上去公园，每次时间都相当短，因为一会儿我就会哮喘并且汗流浹背……现在我在整理过去的笔记，并不是想出版什么，就是纯粹地读一读，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日子我真不能忍受。”



埃米尔·诺尔德

Emil Nolde

1867—1956

“如果在绘画方面我能
有所创新，这难道也是错
吗？”

创新的颓废艺术家

——埃米尔·诺尔德

埃米尔·诺尔德：德国表现派
油画家、版画家和彩画家。以画狂
热的宗教画和预示不详的风景画
知名。主要作品有《基督和孩子们
在一起》、《成熟的向日葵》等。

画家埃米尔·诺尔德，1867年8月7日出生于诺尔德——他根据此地名给自己取名诺尔德，原名汉森——从心之年的创作才思如泉涌，虽然在此之前他生过一场重病。他曾在北海低湿地泽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柏林有一套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在这里他又专门为自己、妻子阿达尔、他的画室、他的工作建造了一处宽敞的新房子。“一个艺术家到七十岁才建一座房子可能为时已晚”。诺尔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37年8月他七十岁生日就计划在刚竣工的房子里庆祝。他的妻子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邀请了许多朋友。埃米尔·诺尔德后来写道：“在‘欢庆的草坪’上鲜花簇立，点着七十盏灯的长桌旁坐着我乡下的亲戚、阿达尔的兄妹们，还有许多朋友。大家高兴地说说笑笑。我的好朋友费尔满怀激情地为我们演唱了他最拿手的歌。我们在院子里享受那静静的美好的夜晚，一直到深夜晚会才结束。北方寒冷的气候很少出现这么好的天气。”

但诺尔德的生日宴会不是一次真正尽兴的、没有一丝遗憾的晚会。许多接到邀请的朋友都没有来，还有一些人的邀请被取消了；因为当时纳粹分子已经上台，控制了德国艺术，对艺术家们实行监控，诺尔德担心他们会把这么大的一个晚会看成是一种挑衅。不久之前，埃米尔·诺尔德刚被划为“颓废艺术家”。同年，纳粹的德国文化协会在慕尼黑举办“颓废艺术”画展，其中就有诺尔德的许多作品。这就意味着这批艺术家将遭到唾弃。

纳粹的行为却没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诺尔德在这次画展中（后来又在德国其它几个城

市举行)仍然获得人们的好评。参展的还有巴拉赫、法伊宁格尔、马尔克、珂勒惠支、贝克曼、迪克斯、克里、柯柯什卡、基尔希纳、马尔克斯、施莱姆和格罗兹这些画家以及其他一些“颓废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被希特勒定义为“有害的”，它们“破坏了人民健康的审美观”。他们的作品以后再也不允许公布于众，展览馆里将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不是被卖到国外就是丢失了。许多“颓废艺术家”不但不能举办画展，就连绘画的资格也被取消了。诺尔德很快就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中。

后来，诺尔德是这样描述那次画展的：“他们命令大部分人去看‘颓废艺术展’，那些艺术作品就在一个恶劣到极点的环境下展出，光线也非常暗淡。刺眼的红纸条上写着纳粹的‘名言’，他们随心所欲地在画上标上天价，随便乱挂以达到破坏目的，手段实在卑鄙无耻。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有些艺术家竟然成为这种行为的帮凶……”

纳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控制艺术，更重要

七十与心所

的是实施“种族主义”和其政治活动。几年之前，诺尔德曾经被纳粹文化协会推举为国家艺术学院主席。当他以“我不行，我不具备这个能力”拒绝这个职务后，他们又要他当学院的教授。这次，诺尔德又借口说他想做自由职业者，把这份工作推掉了。从那以后，他就成了纳粹的眼中钉。纳粹突然宣布他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家”。出版社接到命令不准再出版巴拉赫、诺尔德、马尔克、柯柯什卡和库宾的作品。接着他又被划为“颓废派”、该遭到唾弃的人。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巴拉赫、基尔希纳、克里、雅伦斯基、康定斯基，莱奥·冯·柯尼希还有罗特鲁夫都在这段灭绝人性的时期里去世了。柯柯什卡、法伊宁格尔、贝克曼等人逃亡到了国外……”他则待在国内，他努力为自己辩护道：“我写信，尽我所能竭力抗争。我写道，我是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家中兄妹九个。我是第一个从乡下搬出来的。我不‘颓废’，我的艺术是健康的，它没有一丝夸张或吹毛求疵，也没有一点颓废的特征。”他反问，

是不是只能在经济、技术、政治方面有新发明、新改革?“如果在绘画方面我能有所创新，这难道也是错吗？”

他继续写道：“文化控制达不到目的……只能造成满目疮痍。‘颓废艺术家’的话没有一句有价值。我们艺术家公开被称为‘骗子’和‘蠢猪’；慕尼黑纳粹党的最高领袖宣布：‘这些画家该被枪毙。’”

这时纳粹还没有公开禁止诺尔德的画，他还可以继续工作。但有一天，有命令要求他把前两年的作品都寄到“帝国文化协会”。他寄去了54幅作品：7幅油画，1张铜版画，46张水彩画。1941年8月23日，“帝国文化协会”主席致信给七十四岁的诺尔德：

“根据元首的命令，要彻底消灭所有的颓废艺术作品。您的作品，共计1052件，已被查封；其中一部分已在慕尼黑、多特蒙特和柏林的‘颓废艺术画展’上展出。

您应该明白您的作品不符合1933年以来一直实行的德国艺术家(包括旅德艺术家)进行

九
十
八
年
九
月

艺术创作的要求。这里指的是元首在慕尼黑‘伟大的德国艺术展’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元首一再强调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方针就是为人民、为帝国效劳。这一点您肯定也知道。

您前一段时期的作品表明您到现在还不能符合帝国规定的艺术家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本协会的要求。根据 1933 年 11 月 1 日制定的帝国文化协会第 10 章第 1 条，您因为缺少可信度而被开除出帝国文化协会，并且您不得专职或兼职从事任何艺术领域的工作。

本协会与您签订的 M2603 协会成员书已经无效，请您立即寄还。

齐格勒”

当诺尔德收到禁令时，他正在（他后来回忆时写道）创作高潮。“画笔从我的手中滑落，艺术家的神经是敏感的，经不起打击的。我非常痛苦，因为我再也不能画画了……”

有人会想，他如果不敢在柏林的画室作画，完全可以偷偷地在北海偏僻的村庄泽伯的家里作画，那里安静，充满家乡的气息，只要他不把

画给其他人看,别人就不会知道。但就连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他整天被警察监视着,连早已构思好的画都无法画出来。“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我半梦半醒,变得非常内向,对陌生人很警惕,只和邻居说几句话,而且只字不提我的命运,也从不说我被监视得多惨。我可不想为此付出性命。”

他也被禁止购买绘画用具。但是,“有时我偷偷地在一间小小的半遮半掩的房间里工作。我不能完全放弃……我只有抓住任何机会把一时的想法、构思偷偷地勾画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只要我以后有机会,我就可以把这些‘没有画在纸板上的画’放大成为真正的画”。

因为他很担心挂在柏林家中的画也被查封或者毁于轰炸,所以他把画事先都安置到托普立兹宫,那里后来成为了战地医院。他的那些画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战争结束后“传来惊人的消息,我的画连同被砸烂的家具都被苏联红军一把火给烧了。那是我最好的43幅油画,都付之一炬了”。

战争结束后诺尔德又开始画画了。“真幸运，”他说，“我又能画画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还会有这么一天。《两个人》、《保护天使》、《危险时刻》等作品就是在这时诞生的。接下来的一个夏天情况就更好。”诺尔德七十九岁之际，有一件事情让他特别高兴，他被任命为教授：“六十年前我在父亲临终前对他说过，我可能会当一名教授。现在梦想成真了……七十九岁生日晚会非常热闹，来了许多客人，我的阿达尔也很开心能和大家重逢在一起。”此后埃米尔·诺尔德又活了将近十年，他一直画画、写回忆录。

他最后的几年是在悲伤中度过的：“我亲爱的阿达尔永远地离开了我；我追不到她，因为我还有躯壳。我独自返回，生活在无尽的思念之中。”八十多岁时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第四册即最后一册回忆录：“我一直很清楚，我的尘世生活在她去世之后也没有多长了，因为我比她年长。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我必须再次忍受痛苦，而且我们非常不幸，因为我们没有爱情的结晶。在痛苦的时候总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对我说，

为了艺术而献身。我年事已高,我还应该听从这样的教诲吗?——我亲爱的妻子的逝去预示着我美好生活的终结。我的心里充满忧伤,悄然泪下。”



戈尔迪·梅厄

Golda Meir

1898—1978

“我能理解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人,他们认为一个七十岁的祖母没有能力治理一个成立才 20 年的国家。”

迎接挑战的祖母

——戈尔迪·梅厄

戈尔迪·梅厄：以色列政治家。

致力于犹太复国事业，以色列国的
创立者之一，曾任外交部长、以色列
工党总书记和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政治家戈尔迪·梅厄 1898 年 5 月 3 日出生于基辅，1906 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并在那里长大。她在 1975 年出版的自传《我的一生》里说，她活到七十岁才从百忙之中抽出身来真正度了一次假。她原名戈尔迪·梅尔森。早在年轻的时候她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工党的领导人。1921 年她与丈夫迁居巴勒斯坦。五十岁时她参加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是以色列国的创立者之一。之后，她东奔西走为化解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冲突而努力，但徒劳无益。她担任驻莫斯科公使一年，后一直任劳工部长，1956 年至 1966 年期间任外交部长。后来她又担任由许

多小党新组成的以色列工党总书记。不久之后，她促使以色列工党与另外两个党合并为以色列工党。对此她认为：

“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想，这下我又可以回到我的私人生活里去了，7月份我已经是这么做了。我已经七十岁了，活到七十岁不是一种罪过，但也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1967年我又生病了。不管是六日战争还是其它什么活动我都没能参加，那时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想我应该给自己一点和平与宁静。这一次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我的主意了。”

她飞到美国去看望儿子和孙子，但这并不是一次纯粹的私人旅游，她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以色列在美国争取到一笔借款。紧接着她又飞往欧洲。“我在瑞士度过了几个星期。这次，我认为才是我有生以来真正的一次度假。之后我神清气爽地回到以色列”。

再次回到以色列后，她的工党同仁一致请求她，甚至向她施加压力，要她参加总理竞选。她不想参加，因为她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同仁都

希望她当上总理。后来她说：“我能理解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人，他们认为一个七十岁的祖母没有能力治理一个成立才 20 年的国家。”

在与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商量了很长时间之后，她最终还是决定参加竞选。1969 年 3 月 7 日，戈尔迪·梅厄当选为以色列总理。在自传《我的一生》里，她写道：

“经常有人问我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样的。我渴望我能巧妙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当表决结果出来时，我热泪盈眶，我用手支着头。但就当时我的感觉，我只能说，我都麻木了。我从来没有打算担任总理，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任何公职。我只计划去巴勒斯坦，去麦夏维亚，继续参加工党运动。我从来都没有动过谋求一个职位的心思。我只知道，从现在开始每天我都要做许多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决定。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原因。深一层的思考还没有来得及想。我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我如何从基辅一直走到总理这个位置，这需要时间。现在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一切，可以肯定的是，我对担

任总理一职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担任总理，是因为事情恰巧就是这样，就像我的送奶工被派遣到赫尔蒙山前线当军官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为新职位而特别高兴，但我们迎接挑战，决定尽力去做好它。”

当戈尔迪·梅厄写这段话时，选举已经过去6年，她已不再担任总理了。她经历了以色列最动荡的5年。她刚上任时就爆发了一场战争，任期快要届满时又是一场战争。她不仅要抵御外敌侵犯，还要对付国内各种强硬的反对派。1970年戈尔迪·梅厄以及大部分内阁成员表决通过了美国建议的以色列边界线停战协定后，极右派就和梅厄政府分道扬镳。三年后，她的政府成员纷纷被指责为失职无能，特别是国防部长莫什·雅丹；其实一开始的形势就对以色列军队不利。戈尔迪·梅厄的执政党渐失民心，三至四月间她勉强领导着一个少数派政府。“那时候，”后来她回忆说，“我对自己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引退了，让他们自己看看，他们如何使联合政府步入正轨。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

在已经到了极限。”有关政府的工作,她是这样说的:“五年已经足够了,我的能力有限,不能继续承担如此的重任……”

直到6月初她还在位,然后七十六岁时才引退,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里来。“对我来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生命是上帝赐予我的。我不仅仅经历了以色列的诞生,也亲眼目睹了以色列接受成千上万犹太人的过程。”戈尔迪·梅厄在回答对未来的看法时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和我们的邻国和平相处,但没有国家愿意和弱小的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如果以色列不强大起来,那和平就无从谈起。”她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以色列的真正的和平,也没有能看到她的继任者们给以色列带来的战乱和世界各国的指责。1978年12月8日她在耶路撒冷去世,享年八十岁。



科西玛·瓦格纳

Cosima Wagner

1838—1930

“我的孩子，我已经收到你的信和相关文件。你把事情弄得只有走上法庭才能解决。”

被女儿告上法庭

——科西玛·瓦格纳

科西玛·瓦格纳：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之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艺术指导。

1837 年出生于意大利科摩的科西玛·瓦格纳在从心之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和戈尔德·梅厄不一样的是，她的转变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转变。这个转变没有给她带来权利和影响，相反是损失。而这时她前面还有将近二十年的生命。她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去世(1883 年 2 月 13 日卒于威尼斯，终年接近 70 岁)已经 25 年了。在丈夫去世的这段时间里，科西玛负责管理丈夫的遗产，并致力于提高他的威望和名声，特别是不辞辛劳地担负起拜罗伊特音乐节的管理工作。如果不是她为瓦格纳和他的作品作出的贡献，就不会有拜罗伊特的音乐厅，也不会有《齐格弗里德牧歌》和宗教节日剧《帕西法尔》。

她邀请最杰出的指挥家来到拜罗伊特，以保证瓦格纳的作品的演出保持原有的风格。她甚至亲自导演了《特里斯丹》。不久之后，她发现儿子齐格弗里德是最优秀的指挥家，是瓦格纳音乐的杰出表演者，就像她当年把理查德看成最伟大的音乐家一样。

拜罗伊特音乐节由于科西玛坚持所谓的“传统”而面临僵化，她所规定的一切都不允许有所改变。指挥家菲利克斯·魏因加特纳有一次和瓦弗里德庄园及拜罗伊特的女主人科西玛意见不一致，发生了不愉快。后来他自己的工作定了几条规定：

“1. 凡是瓦弗里德庄园的要求，你就必须准确无误地满足。

2. 即使有时你有不同的观点，但你永远不要说出来。

3. 齐格弗里德·瓦格纳是大指挥家、名导演、卓越的作家和作曲家，你随时随地都得这样讲，并使大家也这样认为。

4. 谁不按上面的几条行事，谁就会受到严

厉追究、指责，不能和他来往。”

尽管他们之间不愉快，音乐节的演出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理查德在世时没能通过其作品获得赢利，而科西玛却做到了。音乐节的收入不仅使她和孩子们生活得很富裕，而且他们还赚了很多的钱。世纪之交时，瓦格纳家族的资产超过 200 万马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科西玛准备草拟遗书，这时她的家庭资产已达到 700 万马克，拜罗伊特音乐节的企业流动资金高达 70 万马克。

七十岁那年，事业有成的科西玛得了中风。她的医生恩斯特·施韦尼格（也是俾斯麦的医生）要求她绝对静心修养：不能接受来访，不能激动，不能出游，特别是不许她工作。现在她必须把音乐节的领导工作转交给四十一岁的儿子齐格弗里德，这一切发生在 1909 年。施韦尼格要求的绝对静心修养，还包括不能看排演以及正式演出。“拜罗伊特的女主人”竟然按照医生的要求做到了！她得了中风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剧院，不管是彩排还是正式演出——多年来只有一次例

外,即她观看《女武神》其中一出戏的演出。

这次重病给科西玛的打击很大。几年前,她就抱怨自己的视力在急剧下降,文件都是由她的女儿读给她听,最后她根本看不见字,她的信也都是由女儿口述的。从1906年开始,女儿埃娃就负责起一切信件来往。后来,科西玛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一些,但始终没有完全恢复。

尽管这位古稀老人住在瓦弗里德庄园——这个她和瓦格纳共同建造的家中最安静的房间里,还是躲避不了烦恼。她的烦恼和恼怒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伊索德;这个女儿1865年出生,当时她和前夫比洛的婚姻关系尚未解除,但已经和瓦格纳同居。和两年之后出生的埃娃以及1869年出生的齐格弗里德一样,她的亲生父亲也是瓦格纳,但是法律上却没有确认这点。1913年瓦格纳去世30周年,他的著作版权最终确立(这是科西玛向帝国议会和威廉二世国王争取得来的),四十八岁的伊索德希望看到自己和儿子的未来有个经济保障,所以她向母亲提出在法律上承认她是瓦格纳女儿的要求。只有这样,她才能确



保在科西玛百年之后参与高达 700 万马克的遗产分配。她不完全是为自己——她患有肺结核，活不了多久——主要还是为儿子。

根据科西玛的传记作者乔治·R. 马尔克的说法，科西玛请求她的女儿不要把这个“隐私”公布于众。弟弟齐格弗里德和母亲的观点一致；他提出每年给姐姐 2.2 万马克（这在一战之前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年收入），除此之外支付她在瑞士达沃斯疗养院的生活费用，还保证负责她儿子的学费。

伊索德没有接受这些条件，而是坚持她的要求，要在法律上确认她是瓦格纳的女儿的身份。她威胁说要进行“不可避免的诉讼，它会给瓦格纳家族带来永远无法消除的耻辱”。科西玛写信回答说：“我的孩子，我已经收到你的信和相关文件。你把事情弄得只有走上法庭才能解决。你的信和文件我已经给了法律顾问特罗，他会帮我解决此事。——妈妈科西玛·瓦格纳。”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科西玛为什么要让这件事走上法庭。也许斩钉截

铁地拒绝伊索德的要求的人,不是科西玛,而是他的孩子们——齐格弗里德,特别是埃娃和她的丈夫。埃娃的丈夫是英国文化哲学家和日耳曼文化的美化者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他在瓦弗里德庄园有相当的影响力。科西玛和比洛生的大女儿丹尼尔认为:“1908年随着埃娃的婚姻,我们的苦难开始了。”她指的是瓦弗里德庄园里出现的家庭分裂,大家对埃娃越来越不信任。埃娃作为母亲的秘书地位优越,同时也受到他人的嫉妒。后来科西玛把自己的日记也传给了她。科西玛的日记里记载了她三十一岁生日一直到瓦格纳去世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她和瓦格纳在一起的欢乐和忧愁。这本日记前几年才未加删减地出版。

不出所料,1913年至1914年瓦格纳家族的这场官司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科西玛在法庭上承认了这个隐藏多年的家庭秘密,即1864年她就和瓦格纳暗地里有暧昧关系。然而女管家的证词说,瓦格纳来访时,科西玛和比洛一直是共用一间卧室。法庭根据这一证词拒绝了伊

索德的请求。报纸上详细地报道了诉讼过程,特别是科西玛还是比洛的妻子时就和瓦格纳关系暧昧这一段。瓦格纳家族成员,主要是埃娃和齐格弗里德受到人们的指责,指责他们兄妹出于私心把母亲硬推上了法庭,最重要的是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蒙受耻辱。七十五岁的科西玛也被人们骂成贪得无厌。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切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科西玛也希望忘掉这一切,特别是忘掉女儿伊索德。官司结束后她和伊索德就再也没有联系,也从不打听她过得怎么样或问她住在哪里。伊索德 1919 年去世的消息也没有人告诉她。科西玛的身体也逐渐恢复过来,她参加德国的政治活动,关心音乐节什么时候再次举行。(一战期间以及战后的六年的时间里拜罗伊特音乐节都没有举办。)有时她也写或者口述一些长信。1920 年,八十二岁的她第二次得了中风,这次比上一次更严重了。但她还是挺过来了,又在瓦弗里德庄园活了整整十年。



安内特·科尔布

Annette Kolb

1875—1967

“在世间又超越尘世的人，游走于贵族和市民之间、德法之间、艺术与现实之间。”

固执的丑小鸭

——安内特·科尔布

安内特·科尔布：联邦德国女作家。从小熟悉上流沙龙的生活，故事小说中常生动地描述 20 年代贵族社会的生活。长篇小说《标本》、《十三封致一位德国法籍女士的信》，反映妇女的命运。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尖形拱顶》。曾多次得过文学奖。

安内特·科尔布一生未婚，晚年曾说起她的“未曾被亲吻过的嘴唇”。她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皇家园林设计师马克思·科尔布，母亲是钢琴家，科西玛·瓦格纳的好友。她的童年是在慕尼黑度过的，从小就生活在双语环境下，一生积极为德法关系的交流和协调而奔波。她深爱这两个国家，和它们有紧密的联系。她在巴登魏勒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到 1933 年她流亡到巴黎。对

此,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曼弗雷德·豪斯曼告诉她,她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离开德国;另一说她当时的处境并不危险,主要是因为她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行为,所以离开德国。她在巴黎申请加入了法国国籍。1940年她去了纽约,然而在那里她感到非常郁闷,战争一结束她就又回到了欧洲。

流亡归来时,安内特·科尔布至少有七十岁。一般都认为她出生于1875年2月2日,也有说1870年2月2日。这样来看她当时可能已经七十五岁,甚至更大些,但她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老。她先在慕尼黑住下来,接着又搬到巴黎,最后她轮流住在巴黎、慕尼黑和巴登魏勒3个城市。

流亡期间,她并没有被德国人也没有被法国人遗忘,她后来得到的那些奖项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她于1913年获得冯塔纳以及格哈德·豪普特曼文学奖之后,于1951年获得慕尼黑文学奖,1953年获得班贝克文化奖,1955年获得大十字勋章,1961年获得巴伐利亚州勋章以及

科隆文学奖、法国十字勋章。她的去世引发文学批评家维利·哈斯在《世界报》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她再活得长一点，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她的著作有《标本》、《负担》、《达夫纳的秋天》和自传体小说《秋千》。1978年这部自传体小说在第一版后的四十年后又再版。“现在这部经典之作又出版了，”罗尔夫·米夏埃利斯在《时代周刊》上欢呼道，“在大家庭里成长的人会觉得这部慕尼黑家族小说很快就把自己带回了家。而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这里也能找到家的感觉……”

库尔特·霍霍夫为纪念她诞辰100周年在1975年2月1日的《世界报》上撰文说：“在安内特的所有小说里都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女人：一个就是年轻漂亮的姑娘，成群的男士向她献殷勤；一个就是聪明绝顶的丑小鸭，终身不嫁。这是她自己的写照，在世间又超越尘世的人，游走于贵族和市民之间、德法之间、艺术与现实之间。九十岁的时候，如果有人称她‘尊敬

的夫人’或‘科尔布夫人’，那么她会生气。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小姐，请！’”

她写散文、进行演讲，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与纳粹作斗争。她很勇敢，评论时敢于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在她的《莫扎特的生平》、《路德维希二世和理查德·瓦格纳》里就体现出来，特别是体现在她从心之年或是在耄耋之年写的自传里。

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有多大，原因当然在于她自己。她相识多年的卡蒂亚·曼八十七岁时说：“她一直严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人。我们计算过，她去世的时候肯定有一百零三岁。”她说，安内特自传里有一段讲述的是1870年发生的事。卡蒂亚认为安内特1870年时至少有五岁，否则她不会记得当时的事情。因此卡蒂亚和托马斯·曼相信安内特肯定是在1865年前后出生的。

如今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安内特·科尔布以及她的作品。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有她的影子，这让她大为生气。卡蒂亚·曼对此曾说过：“安内特·科尔布只是外形上像《浮士德博

卡蒂亚·科尔布

士》中的一个原型的原型：让内特·舍尔，名字就和安内特相似。托马斯·曼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充满爱而且是慎重对待的，但这个人物却有一张‘高贵的、愚蠢的面孔’。这可伤害了安内特，此后她和托马斯·曼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卡蒂亚还补充道：“但托马斯始终特别尊敬安内特·科尔布。”

安内特·科尔布非常钦佩康拉德·阿登纳。1962年她写道：“流亡者战后回到德国、回到家乡见到是一片混乱：被摧毁的城市，废墟下的人们、被盟军解放了的集中营。严酷的事实真相呈现在我们眼前。该对此负责的人却及时地逃脱了，没有人站出来改变状况。就在这时，在德国最危难的关头出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他用了十年带领德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的拯救者：他就是杰出的康拉德·阿登纳。只有阿登纳这位有威望的领导人有限期掌握政权。外国有理由认为限制他执政的时间是有失体统的。”



特奥多尔·冯塔纳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我不期待爱……我只
希望活着就要能自由地抒
发己见。”

人为什么要活到七十岁？

——冯塔纳

特奥多尔·冯塔纳：德国作家，
曾任德法战争中的战地记者。代表
作品有《埃菲·布利斯特》、《施特希
林》等。

“身体虚弱无力，连写几行字的力气都没有，”七十一岁的特奥多尔·冯塔纳这样形容自己。他突然觉得必须精简自己的生活。在过去的14年里他都住在柏林，在那里他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小说：《暴风雨之前》(1878)、《甘泪卿·米德》(1880)、《埃连克立普》(1881)、《梨树下》(1885)、《拉·阿杜特》(1882)、《沙赫·冯·乌特诺》(1883)、《西塞勒》(1887)、《迷惘与混乱》(1888)以及1890年的《施蒂娜》。现在他认为不得不离开柏林了。他在信里说，他决定和妻子一起搬回施密德贝克度过“我们的余生”。由于他几乎不能再写作了，他的收入也“不及从前的一

半,所以要去施密德贝克生活。靠这么一点收入在柏林生活是不可能的”。

写这封信时,他已在西里西亚的齐勒塔-埃德曼多夫,是他的医生建议他去那里疗养的。但是他的病情还在恶化,所以女儿梅特专门带他去布雷斯劳看一个精神病专家。专家确诊为脑部供血严重不足。冯塔纳的妻子当时也在西里西亚,她写信给儿子弗里德里希:“和这个可怜的病人一起度过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其痛苦真是无法描述。医生说必须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爸爸刚刚才同意,现在却又表现得很害怕……看看这个曾经思路清晰、头脑敏捷的人的样子真叫人心碎。”

特奥多尔·冯塔纳,1819年12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诺伊鲁平,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直到五十岁时才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工作,就是以写小说为生。他不愿意去精神病院治疗,而是回到柏林。柏林医生取消了所有的药物治疗,对他采取精神疏导法。当时他严重失眠,无法集中精力去写《埃菲·布利斯特》。医生开导他说实际上

他根本没有病，建议他暂停《埃菲·布利斯特》的写作，去做另一件事，即写回忆录。

冯塔纳采纳了这个建议，写了《我的童年》。在回忆童年的过程中他的神经过敏、紧张不安的状况才逐渐消失，特别是消除了认为自己不久就会死亡的恐惧。他曾坚信，自己会像父亲一样在七十二岁时去世。

当草稿完成进入修改阶段时，即 1893 年 5 月，冯塔纳已经是七十三岁的人了。他熬过了七十岁这个坎，同时战胜了病魔。他又重新回到《埃菲·布利斯特》的写作中。这部小说被誉为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于 1896 年出版。在 1894 年，特奥多尔·冯塔纳被柏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冯塔纳从不追求名誉称号，也不追求地位和公职。因为他太多疑，太理智，而且自由意识特别强；他觉得处处都有约束。甚至七十岁生日庆典，他都想逃避。他在一封信里写道：

“我不期待爱……我只希望活着就要能自由地抒发己见。我内心感到孤独，一个人是活着

还是死去,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一个女佣,柏林本地人,在我们家待了十七年,看着我们所有的孩子一个个地长大成人。如果我去世,她肯定会伤心,但其他人就未必如此。他们来参加我的‘七十岁生日庆典’也只是应付一下。您看见或相信哪个人真正地被关爱过吗?除非他是一个和善、理性的红衣主教,过去在他那里接受过坚振礼的女教徒还会想到他。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改变这个事实。我不想做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让人觉得我相信这一切。我不相信这些。”

有一点他必须相信,因为这是个简单的事实,即他的小说逐渐走红,受到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青睐。他和他的作品不仅得到同龄作家的首肯,也为年轻一代的作家所认可。这一点从生日庆典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生日庆典举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家里私人范围内的晚会,几天之后的第二次才是正式的。关于两次庆典,《福斯报》(冯塔纳七十岁之前一直都在为该报写剧评)作了详细报道。文章这样描述:

冯塔纳的晚年

“传说冯塔纳在七十岁生日那天由于激动、紧张而身体不适的谣言毫无根据。1月4日晚上9点刚过，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在亲人的陪同下，精神矍铄地走进英式建筑风格的大厅。那里300多位女宾和男士——其中有许多是柏林文学艺术领域的精英——在等候他。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诗人、记者都来参加了如此盛大的晚会……”

餐厅以及宴会餐桌被装饰一新，舞池里是神秘的红色灯光笼罩下的一片月桂丛林，中间巍然屹立的是特奥多尔·冯塔纳的石膏像，底座的灯盏发出柔和的红光。许多人都作了演讲，普鲁士文化部长冯·高斯勒也发表了讲话。人们开怀畅饮，后来大厅里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大厅一侧的角落有人喧哗，连最后一个人的发言都无法听到。此时这个老寿星觉得有点扫兴。次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

“宴会上极少一部分人的粗鲁举止让我和其他许多人觉得晚会不是很圆满，就像俗语说的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因为晚会是因我而举

行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对此有责任。”他非常失望地补充说,“人为什么要活到七十岁?”

冯塔纳对晚会最后混乱的秩序这样在意,是有些奇怪的。他的一生都对传统的秩序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秩序早已过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埃菲·布利斯特》的主题,同时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七十五、六岁时他潜心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不过这本书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出版。他把草稿交给《福斯报》预印时附信说:“冬天我写了一本政治小说,反映我们身边贵族的反面形象以及他们的本来面目。此书名为《施特希林》。”

写完《迷惘与混乱》和《施特希林》之后,冯塔纳就没再写东西。他也没有时间,因为当时他越来越需要休息和静养。1898年9月他的妻子外出几天去拜访好友,他在18日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他的身体状况:“我坐在桌旁喝咖啡时还行……但只要一动,我就不舒服。我担心害怕,甚至所谓轻松愉快的事也使我不安。我的安慰就是:‘到九点钟一切就结束了。’我不是想死,而

是十分想得到安静。其它怎样那是他们的自由，那样也挺好的。如此幸运优越的生活，但‘这又有什么意义’？生活是如此，其它方面也是如此，如政治、宗教以及道德方面，都是些空洞无味的言语。以前我还能置之事外，现在几乎不能了。”

两天之后他再次写信给妻子。“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开头是这样写的，意思是在她回来之前他不会再写信给她了，“后天中午我们等你回来。”这几行字的确成了他的绝笔信。当天晚上——1898年9月20日——他停止了呼吸，享年不到七十九周岁。他的女儿发现他斜躺在卧室的床上。几分钟之前，他刚吃完晚饭走进房间。种种迹象表明，他当时感觉十分惬意。



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

“地球的确在转！”

地球的确在转

——伽利略

伽利略：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现代力学和实验物理学创始人。发明了光学望远镜，支持哥白尼的地动理论。

冯塔纳的一生是充实圆满的一生。他安然离世，没有痛苦和恐惧，没有未了的心愿。他的晚年也是令人慰藉的，主要还是他的心胸开阔，比较宽容，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老年人固执的毛病。1564年生于比萨的著名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很早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年轻时就非常执拗了。当他古稀之年经历过那场著名的宗教法庭审判之后，他就更加固执己见了，直到离开人世。

由于当时落后的天主教会不肯承认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伽利略不得不发誓放弃一个已被证实的真理。这只是个不

完全真实的传说。的确,年近七十岁的伽利略不得不公开声明放弃哥白尼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学说。伽利略 1633 年 6 月 22 日在罗马再也不敢说那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地球的确在转!”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伽利略多年来一直宣称哥白尼的体系是一个已被证明的真理,而他却没能提供科学的证据。在他那个时代想证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还不具备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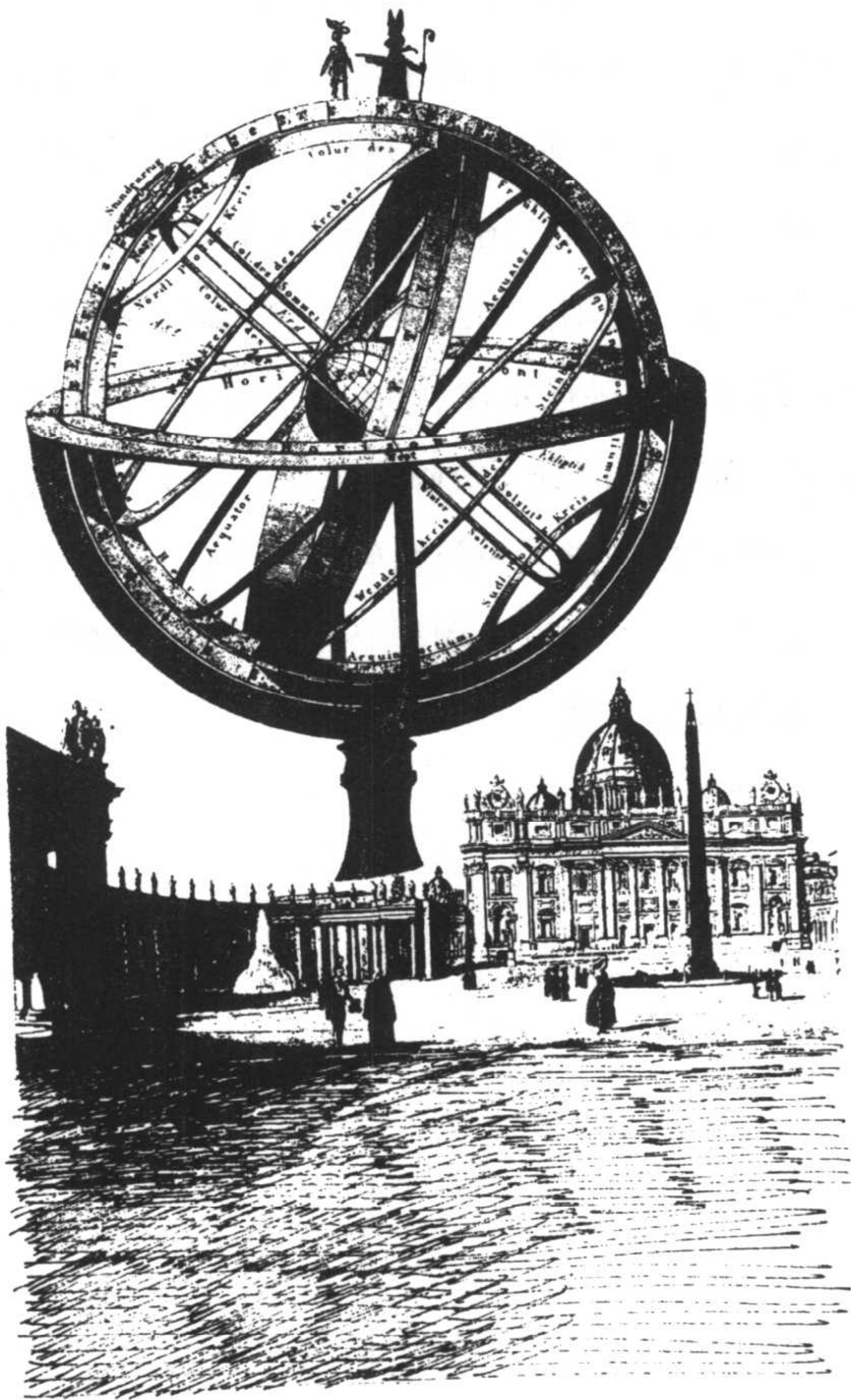
后来在詹姆斯·布拉德利 (1692—1762) 恒星光行差的发现以及 1838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贝塞尔的恒星距离测量的基础上,日心说才得以完全证实。当时罗马教会要求伽利略不要将哥白尼的学说当作绝对真理来论述,而应该把它作为假设理论来对待。

他太固执了。罗马耶稣教团的天文数学专家们已证明伽利略的理论缺乏根据,但伽利略不肯放弃他的观点。如果他肯承认日心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作为一种假说的话,他也就不会为此走上法庭了。

最终他不得不走上法庭，教会判决他必须收回他的理论。至于说他当时受到严刑逼供还坐了牢只是杜撰。虽然伽利略是宗教法庭的囚徒，但没有坐牢，而是被软禁在梵蒂冈宫殿的一间能看到梵蒂冈花园的房子里。他的男仆跟着他在一旁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审判还没有结束，伽利略就回到佛罗伦萨的领事馆。他是佛罗伦萨科学院的数学家、领事，还是佛罗伦萨议会成员。在罗马时，他也处处受到托斯卡纳公爵的庇护。伽利略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正因为如此宗教法庭对他还是非常尊敬的。这在保存下来的审判文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尽管判决书上没有说是“异教”，也没有明文禁止他再传播哥白尼学说，但伽利略的固执最终还是导致他长期坚持的哥白尼学说一时名声狼藉。审判和禁令使哥白尼学说名声扫地。如果伽利略一开始就承认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坚持这是一个绝对真理，哥白尼的理论也许会早些为人们所接受。

形式上法庭宣判伽利略要被监禁，但他却



不需要坐牢。审判结束后,他就离开了梵蒂冈。之后他在大主教斯纳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几年,他在佛罗伦萨附近的阿尔切特里庄园里度过。在那里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年出版)。这本书奠定了机械物理的基础。书里体现了伽利略的伟大成就:他发现了钟摆定律、自由落体定律以及惯性定律。伽利略的真正贡献是在从心之年作出的,即他把物理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1642年1月8日,七十九岁的伽利略在佛罗伦萨附近的阿尔切特里去世。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

“天才就是 99% 的勤奋
加上 1% 的灵感。”

老顽固亏损百万

——爱迪生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举世闻名的美国电学家和发明家，一生共有约 2000 项创造发明。他除了在留声机、电灯、电话、电报、电影等方面的发明和贡献以外，在矿业、建筑业、化工等领域也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和真知灼见。

1847 年 2 月 11 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老年时也很固执。虽然不是僵硬不变，但他一直都是固执己见。当然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天才发明家。他总是固执己见，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他从来都不会融入任何一个业已存在的体系中，也不愿步入一个前人已经设计好的轨道上来。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一点也不喜欢上学。

“我至今还记得，”后来他说，“我从来没有准时到校。我是我们班最后一名。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师不喜欢我，也觉得父亲可能会认为我是个笨孩子。”他在学校仅仅呆了三个月。当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是个笨蛋时，八岁的他很伤心，随即离开教室跑回家对母亲说，他再也不去上学了。他做到了。那时还没有义务教育，要在今天就行不通了。他不但再也没有去那所乡村小学，而且这一辈子都没有再上学，不听任何讲课，当然也没有上大学。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学说”的侵蚀。跟母亲学完读写之后，他自学成才，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大名鼎鼎的发明家。

他共申报了 2500 多项专利。他设计出碳精送话器，从此改善了电话的通话效果；他发明了留声机和碳丝灯；1881 年在巴黎的首届博览会上他展示了一个和蒸汽机连接的发电机；1882 年在纽约使世界上第一个公共供电系统运转。爱迪生在电影技术方面也有突破性的进展，他发明了摄影机；他改进了混凝土浇

注过程,完善了蓄电池,发现了“爱迪生效应”。这些还只不过是他的若干发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他闻名于世且非常富有之时,每当他过生日,记者都要对他进行采访。他也热衷于此,原因是这样可以给他和他的实验室做免费广告。记者们也喜欢他,因为他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一一作答,对答如流,而且敏捷俏皮,语出惊人。他的回答都有思考价值——谈自己、家庭成员以及平常的家庭生活,谈摩登女郎,谈时尚、饮食、医药、体育,谈吸烟的坏处,谈教育、战争、宗教,还有科学的进步和未来。

此类采访通常这样开始:“爱迪生先生,祝您生日快乐。今天,您的心情如何?”这个问题他好像每次都是提前准备好了似的。一次,他把刚刚工作过的实验桌清扫一空,大叫道:“软得像丝绸!”还有一次他说:“祝福一个人又老了,真是见鬼!”七十五岁生日时他回答说,他感觉自己只有四十五岁。

最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他成功的原因以

及成为天才的要素。关于天才,他用了一句被后人多次引用的至理名言:“天才? 天才就是 99% 的勤奋加上 1% 的灵感。”就成功的诀窍,他回答说:“工作可以揭示自然界的秘密,并应用于改进人类的生 产。”他从来都不觉得疲劳,他说,“就像医生给我接上氧气瓶。”他每天工作两班,总计 16 个小时。

就睡觉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什么成就,是因为他们一生中太多的时间被睡眠占去了。爱迪生每天只要睡四个小时就足够了,晚年才延长到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他除了工作,其它什么都不愿意做,也不会做。晚年的时候,当别人遇到他不“忙”的话,他还会觉得难堪。另外,他的朋友亨利·福特也是这样说他:“工作是对人的解脱。上帝工作,为了把地球从不进取的人那里解放出来。”

爱迪生不赞同大吃大喝。他自己吃的量就非常少,但花样繁多。他认为,美国人应该“控制饮食”。运动和做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只要我

二十世纪的成就

的身体能支住我的头就可以了。”当有人问他，上帝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真正的上帝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他反对一切迷信，他说上帝是“抽象的”，大多数人“笃信宗教”，但成千上万个祈祷并没有能够阻止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的发生。

爱迪生七十岁时，受美国政府之托研制潜水艇的防御装置。1916年12月美国海军元帅约瑟夫·丹尼尔斯找到爱迪生，并且告诉他，英国海军领导机构认为如果不能歼灭德国的潜水艇，那么协约国将会面临失败。德国于1916年2月起开始使用先进的潜水艇来攻击武器装备齐全的商贸船。1917年2月德国宣布开始无限制潜水艇战（反对协约国对德国实行粮食禁运），即不管什么船只，哪怕是中立国船只，没有事先警告就一律击沉。这就是美国参战的原因。爱迪生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防御装置的研究中去。他设计了一整套潜水艇防御系统。这位古稀老人写信给老友亨利·福特说：“我几乎整天都呆在大海中60米长的军用潜水艇里。我将在

新伦敦内陆水域逗留一段时间，还要做好几个实验。”

此外，爱迪生还发展改进了振动探测器，它能够及时捕捉到鱼雷发射的声响，并能够预测出鱼雷发射的轨迹，这样目标船只就可以在被击中前偏转方向。表面上他和海军军官们相处得并不好，但他们还是合作成功了。战后，爱迪生说：“战争中我有大约 45 项发明，他们把这些都用于那条长船上。那些海军军官都非常讨厌我这个平民的加入，这些家伙自成一伙。”这让老人很失望。1920 年他七十五岁之际人们要授予他军功章，但他拒绝接受。

随后的几年里，大约在 1923 年前后，爱迪生的实验随着整个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也取得巨大的成功。爱迪生将大部分管理工作交给儿子们打理，自己潜心研究改进留声机。但当时收音机已经走进市场，并且大受欢迎。此外，其它公司已经生产出用电的留声机以及收音机和电唱机的一体机。机械留声机之父爱迪生固执地将这些新事物拒之门外。虽然他的几个儿子努

收音机?
留声机!



力想说服他介入收音机业务,他却说“对收音机的狂热”会消失,人们更愿意自己选择爱听的音乐,而不是随便哪个电台来替他决定。1925年他给同事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如今的收音机肯定是要失败的……早晚商人们会丧失对收音机的兴趣。”

他一直抱有这种想法,即便是后来他的留声机业务迅速下滑,他花了40年时间建立的有1.3万家留声机销售商参加的组织面临崩溃之时,他也没有改变初衷。他的儿子们想征得他的同意去生产收音机和电唱机。但爱迪生一直不批准此类计划,直到时机错过。

在此期间,他的三个儿子偷偷地开始生产电唱机。当“老人”知道此事时,他下决心搞一个留声机项目来和儿子们比一比。他雇用了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作助手。当爱迪生发现此人使用的完全是时新的科研方法后,又立即将此辞退。爱迪生用他的老一套“经验”来测试新的留声机模型,即借用听力来测量频率,不过当时他已经听不见什么了。

爱迪生传记

年近八十的爱迪生最终向儿子们妥协了，决定生产收音机，但已经为时过晚。同行竞争者早就遥遥领先，美国经济也是日落黄昏，每况愈下。1930 年爱迪生公司在生产了 40 余年的留声机和唱片机后，最终建立了收音机生产线。但仅仅两年后收音机生产就停止了，因为爱迪生的顽固不化导致公司亏损两百万美元。诚然这对这个百万富翁来说并不构成威胁，但员工们却因此而陷入困境。

爱迪生八十岁以后逐渐从他的发明创造生涯中退出。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从事的完全是另一个领域的工作。他苦寻一种可以在美国生长而且能提取橡胶的植物。后来，他的妻子说：“我们家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橡胶。我们谈论的是橡胶，做梦也是橡胶。爱迪生不让我们做其它任何一件事情。”八十二岁的爱迪生说：“再给我五年，美国就可以有自己的橡胶。”但上帝没有再赐给他五年的生命；1931 年 10 月 18 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去世，享年八十四岁。虽然他找到了能提炼橡胶的植物，但是提

炼难度却非常高,而且质量也比天然橡胶差多了。

161



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完美的爱才能让人体会到世界上最美的幸福，但爱是说不尽、写不完的。”

充满了幸福……

——卓别林

查理·卓别林：原籍英国的美国电影演员和导演。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因无声电影人物一个哀婉动人、幽默风趣的流浪汉而蜚声国际。作品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

“人老了会郁郁寡欢。”这是自然科学家、作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腾贝格知命之年在他的《草稿集》里写的一段话。但这话未必正确。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伦敦的查理·卓别林，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并献给比他年轻35岁的、共同生养了8个孩子的妻子奥拉。但从回忆录里一点也看不出他老年时心情不好或者郁郁寡欢。或许他后来也有了忧愁。在这本名为《我的故事》的回忆录结尾处，这位

七十八岁所感

古稀老人勾画了一幅幸福的图画，这可能也是许多人所期望的人生结局：

“我身体健康，而且还不断有创作灵感——我计划继续拍电影——我自己可能不会去担任角色了，我想给我的家人写剧本并导演，因为我的几个孩子们都表现出一定的表演天赋。我还是很想做一些事情的，我不会退休从而放弃我的追求。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叔本华曾经说，幸福是一种不良状态。但我却不同意这一点。近20年里，我理解了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命运赐给我一个神奇的妻子。我期望我能多写点有关爱的东西，完美的爱才能让人体会到世界上最美的幸福，但爱是说不尽、写不完的。我和奥拉生活的这段时间，她的深邃、她的美好品质一直在打动我的心。她在维维亚狭窄的人行道上优雅地走在我身前时，她那苗条高贵的身材，她那梳得笔直夹着几缕银丝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被她的美丽所征服，有一种爱如潮涌的感觉——我喉头哽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我有时被这样一种幸福感包围着，在落日时分坐在屋顶的平台上，眺望远处绿油油的草地、遥远的大海和连绵的山脉。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什么也不想，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这份宁静。”

查理·卓别林，这位著名的演员兼导演，这个出生贫苦但最终十分幸福的人，这个用他的电影、他的表演让成千上万的观众为之捧腹大笑的人，这个有时也令人深思的人（他去世之后他的影片仍很受欢迎），在从心之年完成了这本回忆录。在他接下来的13年里，他幸福地生活着，梦想着，思考着……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